

# 陈独秀先生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信札

文 / 庄绍平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乳名阿培，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祖籍浙江诸暨。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本信笺由陈独秀先生致蔡元培校长长函，内容关于北京大学任职事宜。信中也提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先生。

二位先生俱是中国20世纪初学界与政界甚有影响力的人物。

1917年初，因陈独秀学历不足，蔡元培破例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sup>[1]</sup>，倡导民主与科学，助力北大成为新文化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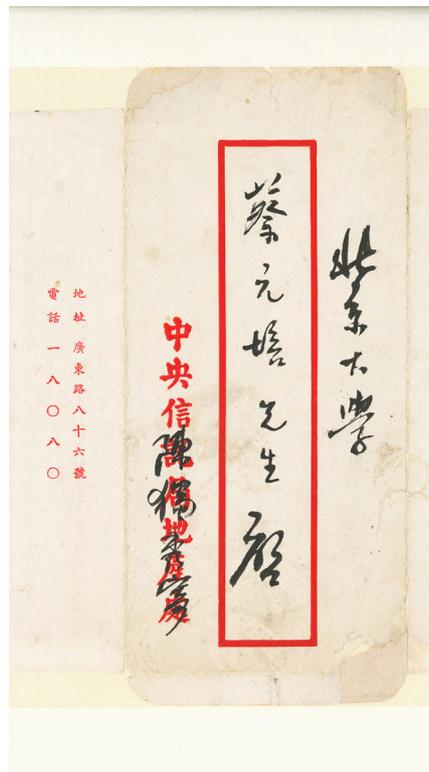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男，汉族，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动的中心，推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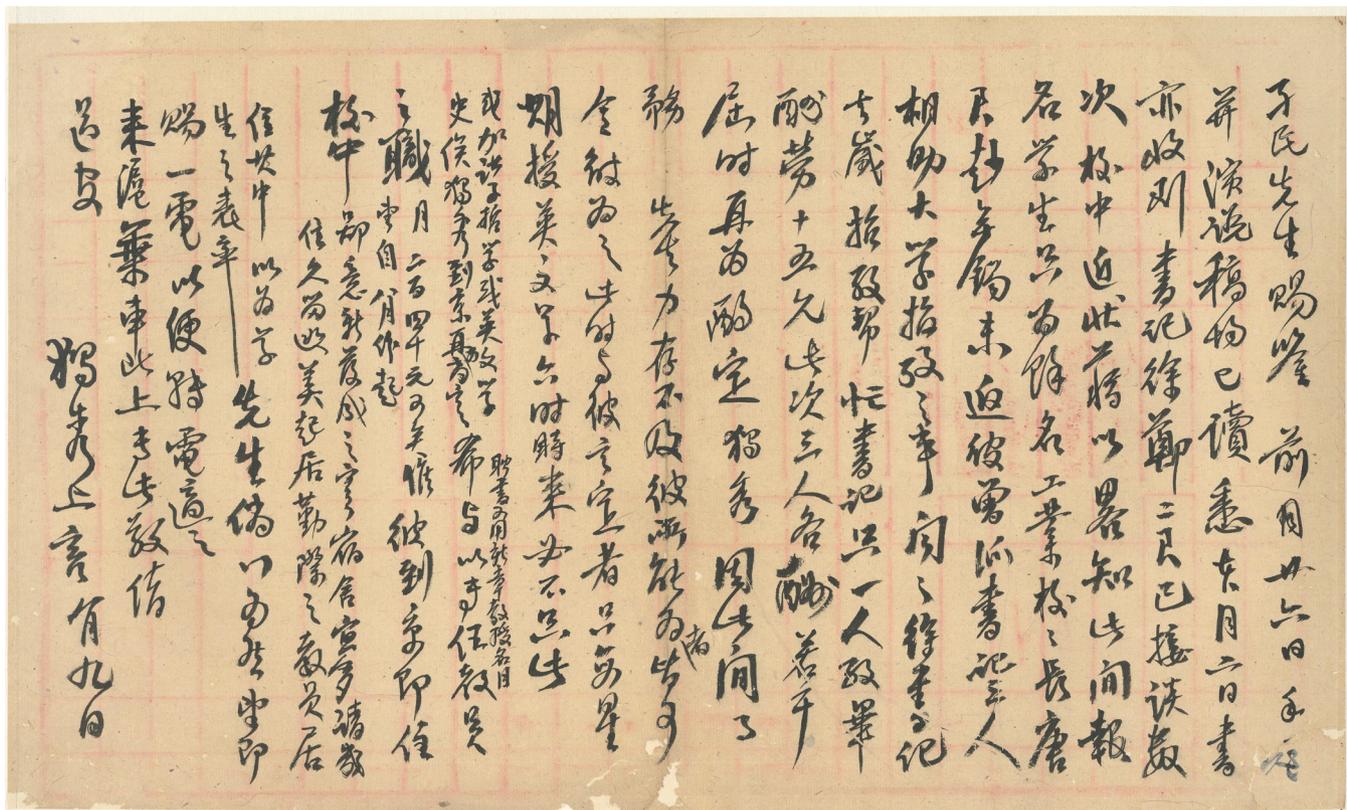
陈独秀（1879—1942）

早在上任北大文学科学长之前，陈与蔡皆为老革命党人，二人互相信任，思想契合，志向趋同<sup>[1]</sup>。陈独秀在清朝光绪末年（1904）与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谋划暗杀活动<sup>[2]</sup>。



在上海期间，陈、杨在一间出租房里实验炸弹，蔡元培先生也常在实验室内和他们聚会论事。后来，暗杀行动以失败告终。<sup>[2]</sup>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安庆，属士绅门第。他早年受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参加了清廷科举考试。但他考上了后，受到康梁变法思想的影响，决定不仕，成为维新党成员。作为对义和团起义（第



信札与信封：陈独秀先生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子民先生赐鉴：

前月廿六日，手示并演说稿均已读悉。本月二日，书亦收到。书记徐郑二君已接谈数次，校中近况藉以略知。

此间报名学生，只为余名，工业校校长唐君赴无锡未返，彼曾派书记三人相助大学报考之事，闻之徐书记去岁报考帮忙，书记只一人，考毕酬劳十五元。此次三人各酬若干，届时再为酌定。

独秀因此间事务，先生力存不及，彼所能为者，皆可令彼为之。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学六时，时来必不以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希与以专任教员之职，月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作起。

彼到京即住校中。鄙意新落成之寄宿舍宜多，请几位久留欧美、起居勤际之教员，居住其中，以为学生之表率。

先生倘以为然，望即赐一电，以便转电适之。来滬乘车北上，专此敬请道安！

独秀上言八月九日

一次革命)的惩罚,1900年,帝国主义强加中国的巨额赔款。陈独秀开始发挥他强大的领导组织能力,展开暗杀行动后的第二次革命。陈独秀和柏文蔚、常恒芳等,配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装军,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后和同盟会建立联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积极参与,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曾五次东渡日本。<sup>[1]</sup>

1901年,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日语。6个月后,他虽回到安庆,但东京的日子让他萌生了救国的动力。

于是,他开始办报、结识社团、演说。他和潘赞化、葛温仲和何春台等人,在安徽安庆一藏书楼内演说,讲述及陈列自己从东京与上海带回的各种革

命书刊,并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传播新思想。可是,他们的活动很快便引起当局的注意,故陈独秀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1902年,陈独秀与潘赞化一同到日本,就读成城学校(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陆军科),结识了关心政治时事的汤尔和。汤尔和非常赏识陈独秀,十几年后,汤也推荐陈独秀任北大的文学科学

務 此等力存不及彼所能為也

令彼為之 此則與彼之定上者 只與星

期授美、又早六時時來 必不以此

或加諸子推學或美收學 聘書可用於教育教員名目  
史侯獨身到京再為定 希 與 以 專 任 教 員

之職 月二日四元可年惟 彼到京即任  
中 中 自 月 作 起

松 中 却 意 新 成 之 宜 宿 居 宜 多 請 教  
信 久 為 以 美 起 居 勤 際 之 教 員 居

信 共 中 以 為 字 先生 倘 以 為 中 即  
生 之 表 幸

賜 一 電 以 便 特 電 通 之  
來 滬 乘 車 此 上 幸 甚 教 信

呂 友 獨 來 上 言 有 九 日

牙氏先生賜鑒 前月廿六日午  
 并演說稿物已讀悉 廿月二日書  
 亦收到 書記徐鄭二員已接談數  
 次 校中近此將以畧知此間報  
 名 學生只為解名 工業系校、長唐  
 君 赴年錫末 迫彼曾派書記等  
 相助 太子指致之幸、同、徐書記  
 十歲 指致部 忙書記只一人 故畢  
 酬勞十五元 此次三人各酬善平  
 屆時再為酌定 稍為 因步間了

长。

当时，俄国侵占东北不撤兵。陈独秀想学习军事，也参加了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但清庭请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非常愤怒，就把亲清府的学监姚煜割发代首，挂于留学生会馆梁上示众。日本警方因此事件把陈独秀遣返中国。

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暑假旅游，后回皖江中学任教。又因为利用“芜湖图书社”进行革命活动遭到追捕，他在1907年被迫第四次前往日本。

在日本，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等西欧文化，也在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时期，他和章士钊、苏曼殊交往密切。

两年后，陈独秀回国，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1914年7月，他又东渡日本，帮章士钊编辑《杂志甲寅》。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筹备《青年》杂志，后由群益社出版。这本杂志主要宣扬民主与科学，提出对青年的六要求<sup>[3]</sup>：

- 1.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 5.实力的而非虚文的；
-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杂志。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

那个时代，北大校方腐败，北京仍在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圣，委任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校长提倡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创办科研结

果，倡导平民建议，男女同校，大量引进新人物，不拘一格。

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学科学长。陈独秀遂将1917年就任把《新青年》总部迁到北京。同时，编辑部扩大引入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鲁迅等。《新青年》推动批孔运动，批判传统道德观念，宣扬民主主义思想。

1916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以白话文翻译俄国小说《决斗》。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争议》，推广白话文，打破旧思想及推广文学改革。<sup>[3]</sup>

1918年5月15日，鲁迅发表批孔白话小说《狂人日记》<sup>[3]</sup>

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他因此辞去北大文学科学长一职，前往上海。

1919年12月，陈独秀刊登《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

1921年，胡适认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反对。

1920年，中共发起组决定将《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第8卷第1号改为党的机关宣传刊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蔡元培校长（1868—1940）<sup>[5]</sup>

蔡元培，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人物、翻译家、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蔡元培25岁中进士，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人宽厚，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他积极学

习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法国大革命风潮，把中国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创立了现代教育制度。蔡元培力图把北大学术化，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深感清朝政治改革没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中西学堂总理，提倡新学。

1900年秋，他不满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干涉，辞职了。1901年夏，他到上海，前后在澄里学堂、南洋公学任教，传播爱国民权思想。次年，他发起中国教育学会，创办爱国女学，后因清政府下令侦讯，不得不前往日本留学，暂时躲避起来。

1904年，蔡与陶元章、魏兰、龚宝铨等建立光复会，与陈独秀密谋武装起义。次年，他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他到德国留学，学德语一年。

1908年至1911年，他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取道西伯利亚回中国。1912年1月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三天后任命蔡元培做教育部长。

4月，蔡元培与汪精卫等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主张新共和要以民气民智先进，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苦学之风，以柱其事之实行也。

蔡元培主张教育应从现世幸福出发，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倡导摹仿西方教育制度。除此之外，他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

1913年，蔡元培在德法从事教育、

哲学和美学研究。

当年，北大校方腐败，中华民国大总统委任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延聘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辜鸿铭等。

蔡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复古主义，倡议以科学和民主学为内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sup>[6]</sup>

胡适 (1881-1962) <sup>[5][6]</sup>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提倡科学、白话文、自由民主观念，诠释了“自由”的消极与积极意义。

消极“自由”是指欧洲文学里的解放自由，是从外人束缚下解缚，得到自由自在。积极“自由”是依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指“由于自己”，也就是说“由自己作主，不受压迫”。

他注重积极自由，但不忽略消极自由。在消极自由基础上，他提倡民主宪政运动，主张立法予人民有利的环境，以免除束缚自由。

他主张“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批评旧家庭与旧社会的强迫，限制与束缚个人的传统文化。

胡适强调法律的超越性与支配性，提出政府应该“以身作则”，实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文絮：旧时通讯不便，远程联系以信札为主。作者书写信笺后装入信封，私下或邮寄传之。

古代文人常亲笔著信以交流，行文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内容言简意赅，亦显作者之文学功底、文化素养及社会地位。上款者与落款者之关系，如师生五伦，于用词语气可揣测。又从落款日可知著作年代，若无则从纸墨推之。



庄右铭先生于2005年捐赠三千册线装古书给新加坡理工大学图书馆。校长徐冠林博士(左一)和庄右铭(坐)庄绍平(右一)及家人合影。

此信乃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其文字精简、行文流畅，又提胡适于斯，平易谈论北大事宜。

此信札由本人庄绍平藏。本人新加坡华侨、企业家、斯坦福大学航空航天硕士，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文化部高级书画评估鉴定师。曾任新加坡官委委员、中华总商会董事、新中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赞助“新加坡凝聚力”、编《庄右铭文集》《庄右铭回忆录》等书籍。本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志，受恩于家学培育。先父庄右铭光绪三十四年生于今福建泉州，幼年家境贫困，后为孤儿，学涯坎坷，青年辗转多地，终于新加坡成家立业，一生彬彬有

礼、敏而好学、诲人不倦、好善乐施，是位颇受称誉的教育家、企业家与慈善家。

#### 参考资料：

- [1] 南方网 8月20日 - 应付教育部官僚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
- [2]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 陈独秀 1940年3月24日。
- [3] 新青年。
- [4] 蔡元培 - 维基百科。
- [5] 胡适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之要义。台湾大学图书馆。
- [6] 中国近代史下册第21章“思想革命” - 徐中约著。

# 海外儒学要发扬浙东学派的精神 ——读《浙东学派溯源》有感

文 / 庄右铭



## 庄右铭

1908年农历九月出生于福建省泉州惠安山腰县。1927年11月南下星马谋生。1931年夏，北至上海暨南大学念书。1935年，于上海公学政治经济学毕业。1936年，获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毕业证书。1936年，往广东惠州和平县和平中学任教。1937年10月，第二次南下，在新加坡道南学校任教。1938年春，在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教高一国文及级任老师。1939年秋，任吉隆坡中华中学老师。1940年春，在新加坡中正中学任教，兼事务主任及图书馆主任，拟写校歌歌词。

1943年，与谢荔圃千金谢金珠结婚。1949年下海从商，1952—1996年，任中正中学董事部秘书/董事；1965年8月，新加坡中国银行资金短缺，即日存入25万新币帮忙解决危机。1996—2007年5月，任中正中学副董事长，服务于中正中学前后67年。1986年，创立新加坡乐龄书画会，被推举为新加坡暨南大学校友会会长。

2001年，创办新加坡儒商学会，受委首届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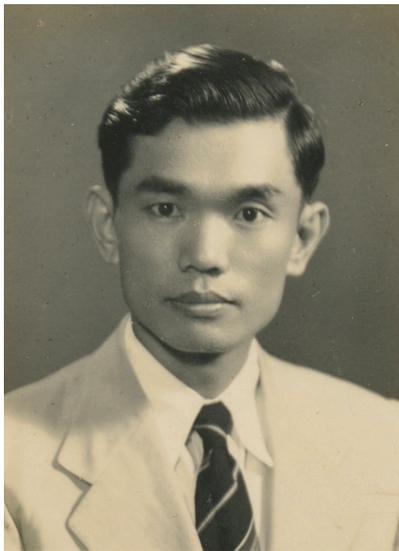
2006年，捐赠11套3400册中国古籍经典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

2007年5月逝世，享年9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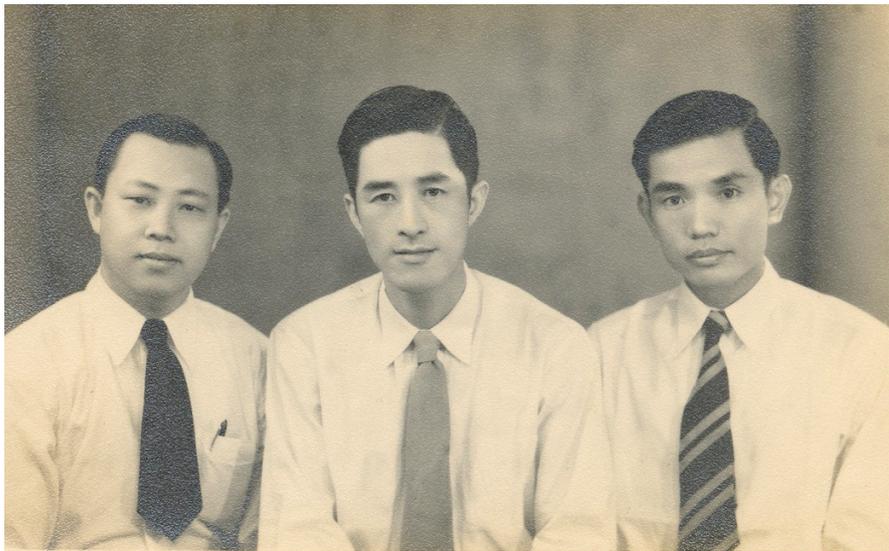
### 一、华人向外移民的动机

中国人向外移民，其动机应分为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二类。非经济的自唐末以来，佛僧往来甚盛，初期由陆路经西域逾葱岭而去的甚多，迨海路通航，由海路通往者不少，如晋法显于公元339年赴印度，416年由海道回国，著有《佛国记》。北魏时的宋云于公元518年赴印度，著有行记。另一种为受政治压迫而避难海外，成为移民动因之一。就全部移民史观之，共有四次：第一次为唐代黄巢之乱而避难至南洋，此为华侨有规模移民之始。第二次为蒙古族入占中国，宋遗民之避居南洋。第三次为满洲人主中国，明遗民之往南洋。第四次为太平天国失败，其党徒逃难至海外，范围更由南洋而扩展到美洲。20世纪30年及40年，国家内忧外患频仍，海外华侨人数增加甚多。至于由政治性的军事扩充而殖民者也有，如元世祖远征爪哇、明郑和之七下西洋，均为我国移民之光荣史实。

谈到经济动机的移民，由于近数百年来，中国的园祚衰落，内忧外患，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南方边海省份的老百姓在饥寒交逼的情况下，相率向海外逃荒，目的只求一饱而已。当时的交通工具还很落后，以木船远航危险性很大；中途遇暴风雨，全船覆没，人命就此葬身鱼腹是常有的事。由于运输条件限制，为求性命安全，尽量等待季候适



年轻时的庄右铭先生



庄右铭和同乡庄晚芳(中国茶专家)等合影

宜的时节出海，目的地不能太远，最适宜的地点是沿南中国海一带的东南亚地区，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来、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在这些地区沦为欧美殖民地以前，闽粤穷人已陆续移居到这里。他们除了明初永乐时氏随郑和七下西洋时留下来的外，其余的都为饥寒而冒险自我流放的。东南素来气候炎热，物产丰富，生活容易，逃荒到这地区来至差是能得到最低的以果蔬充饥的生活条件。

到了19世纪中期，殖民地主人为诱使劳工前来，效法欧洲贩卖黑奴的故技，到中国招募工人。他们表面上称其为契约劳动，而实际待遇与黑奴无异，即西人称为苦力贸易，即我们所谓贩卖“猪仔”是也。当时的贩卖站是以新加坡为中心，“猪仔”由中国闽粤二地运来，除马来西亚外，更输往苏门答腊及北婆罗洲一带。直到1914年始由海峡殖民地政府下令撤销，“猪仔”贩卖才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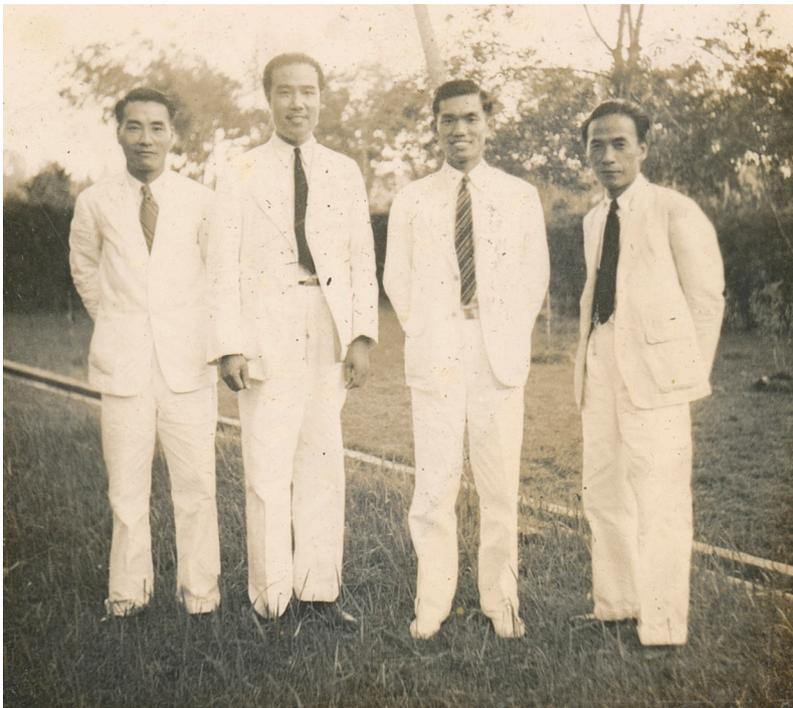
早期的移民，他们在故乡由于家境贫穷，没有读过书，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过的“猪仔”劳动生

活，而雇主仍不满足，又设赌场烟馆，尽量使“猪仔”以血汗赚来的工资，不是赌钱输光，就是抽大烟成瘾，这样便一生跳不出“猪仔”劳工的火坑。那些勤俭自律的劳工，劳力契约满期后，有的可以自由回国，但他们多数留在当地，与早期定居在当地的华裔聚族而居，使得当地华人人口逐渐增多。东南亚地区，华族南移的人数以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为最多，我自己便是于1927年冬投荒到星马来的。这时的移民虽同样是为衣食而向外逃，但已不再受劳工契约的束缚。而且这些移民的文化水平也较高，从事的工作各行各业都有，如工商业、医药、教育、宗教等，几乎人类一切养生送死之类的服务都有，形成华人独特的社会组织，即不碍于殖民主人的统治，又能与当地的原先居民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下去。

早期移来的华裔，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但脑子里的为人处世观念并不空白，他们从祖先历代相沿的家庭传统中，耳濡目染的儒家的基本观念，却很牢固地保守住，所谓基本观念即做人应有“忠、孝、信、义”几个字的简单信

条。尽管生活作风粗犷，但在家里却很自然地表现出事亲孝，兄友弟恭的爱，对外的谋生处世能恪守信用。这种基本观念也造成华裔在海外的凝聚力量，华裔永远是华裔，不会被族同化。还进一步在居留地作秘密结社的活动，起源17世纪的“天地会”，后称为“三合会”，其目的在反清复明，脑子里的意识有个“忠”字。忠于已故的明朝故主。到了19世纪初，“天地会”已普遍于南洋各岛，远及美洲，如罗芳伯之占领缅甸，叶来之活动于吉隆坡，皆借“天地会”之力。早年新加坡华人之暴动，皆由天地会而发生。1857年沙劳越华工起事，占领首城古晋。1862年吡叻矿工之纠纷，也为“天地会”所发动。“天地会”拜祀的神祇是关羽和岳飞，象征忠义，此乃儒家思想的明证，但这是违反社会的非法行动，不足称道。

华人移民有潜在的儒家传统意识，“天地会”组织部全凭儒家的“忠义”二字的教条，号召党羽，出生入死，干出他们认为替天行道的侠义勾当。这是儒家思想被非法利用了，但却反映了儒家思想能在下层社会里起很大作用。到



1938年,庄右铭(右二)在南洋女中任教时与同事合照

了19世纪后期,华人经营的工商业有了发展,也就有条件开设学塾、书院让华裔子弟读书。华人在殖民者统治下能遵守社会秩序,普遍安分守法。“天地会”私会党的活动也渐渐消失,这与当地政府实施镇压不容存在有关。

## 二、儒家思想演进到宋代分成三大学派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后,世代奉为正统。到了宋代,儒家受佛老二家阔大幽渺的教义所濡染,已不能如前代再局限于训话章句的范围,而必于儒家自己的言行中另辟一阔大幽渺的境界,方能自展,而且又足于与佛老二家相抗。此所以竟趋于心性之理论,宋代理学即由此而盛。宋代是继五代十国政治混乱而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新王朝。新王朝建立后,政治是安定了,但社会风气仍不健康,指导人民

精神生活和支配社会人心的是佛教。佛教是出世的,所追求的是另一非现实的世界,对眼前的尘世推不出一套入世的健全社会和安定民心的理论与方法来。至于道家在西汉初期对实际政治发生过作用,但在魏晋清谈而至“五胡”之祸后,世人也不敢再谈了。因此宋代的知识分子只有在儒家的教义中,重新深入探索了。儒家的学说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本末而言,“内圣”是本,“外王”是末。“内圣”之道旨在造成一个健全的个人,若干健全的个人可以扩大其影响以形成健康的社会空气,从而培育人才,刷新政治终至富国强兵,而达到“外王”目标。所谓健全的个人,最高境界是“圣人”,故宋代的理学就是研究如何成为“圣人”之学。

宋代儒家的主要学派有三,一是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自

格物至修身,乃是“内圣”功夫,“内圣”功夫,“内圣”功夫不能坐视生民穷困而无动于衷。朱熹曾说“天生一个人,便须管着天下事。若要不管,须是杨氏为我方得,其却不曾学得这般学。”他所倡“致知、格物”功夫,可以追往真理,也可以追求其他事物的真理。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之在人谓之性,故圣即理,而人皆可为圣人。”如何致知呢?致知在格物,格物最重要是读书,为的是“读书以现圣人之意,圣人是经历见识多,所以写在册子上与人看。”朱熹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能做到这地步,便是达到格物致知的尽处。朱熹的这种修养理论,被清代颜习斋深斥为纸墨诵读之业,只能闭目静坐,无视天下病痛。这样的指责,值得我们反省。

另一学派为陆九渊。他主张理是 本心,不用到外面寻求做人作事的法则,人只要能明义利之辨,求自本心,天理便自然呈现出来。这与朱子的格物致知,先涵养后省察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陆九渊的思想受佛家的反省悟道的影响很大,而朱熹的思想与道家太极图说有关。二人的思想立场一直争辩不休,一个是“尊德性”,一个是“道明学”。朱熹把儒学本有的义理,即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性善,《易传》中所说的天道、天理,即人的道德之性集大成而成为宋代儒学。陆九渊是南宋另一位儒学大师,他不满朱熹主张“居敬穷理”的说法,认为朱子学不见道,他教人在心上作明辨义理的功夫,只要义理辨明,人的本心便呈现,即理在其中,顺着这本心,自然能孝悌忠信。朱、陆二人的儒家义理观点尽管不同,却都是从唯心论立场出发,主观的看法不同;但是旧时代的社会里的一



Source: Lianhe Zaobao © SPH Media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回首日军大检证，无尽悲愤涌心头”综合新闻头版，庄右铭先生指出：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里等候检证

般世道人心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浙东学派大师吕东莱见两位大师学问见解不同，由于他和朱、陆两位有知洽的关系，便联络二人作一次交流，希望好好讨论沟通意见，以求得到两人同意的结论，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的江西鹅湖会议。当时出席的有朱熹、陆九渊、吕东莱，还有九渊之兄九龄。朱、陆二人讨论了十天，调和异同的目的终不能达到。陆九渊有首诗指摘朱熹的观点，其中两句：“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批评朱氏的学说支离、泛滥，像在海中浮沉，永不能到岸。三年后，朱熹追和一首，最后四句为：“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说陆氏空谈道体，不顾事理，忽略了一切千变万化的事情。

宋明以后移民南来的华裔，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他们的家庭传统观念中的潜在意识，都深受朱、陆二家的道德观念影响，尤其是朱派的思想更被普遍运用和实施；作为做人的伦理道德的准则，高低层社会人士均如此，甚至目不

识丁的人也是如此。

上面讲的儒家思想在海外成为华裔生活的指导方针，相沿已历数百年不变。华裔守着自己祖先传留的意识形态，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华裔充其量只能在“内圣”方面下功夫，希望养成一个健全的人格，进一步使华人社会成为更健康的社会，但也不能向“外王”的目标去发展，使居留地新兴国家能革新政治，终致富国强兵等等。华裔的生存能量只能在道德的理念上，做一个守己安分的良民。

### 三、海外儒学应继承与发扬浙东学派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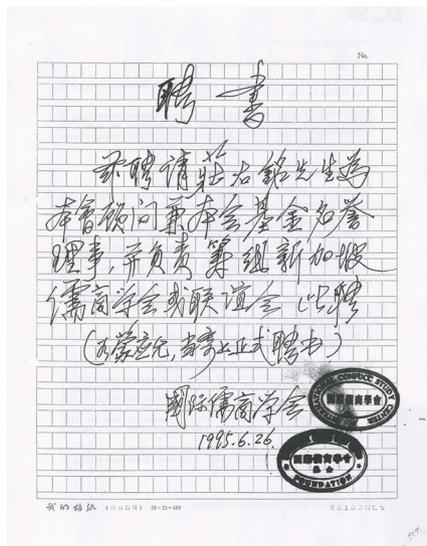
今日的华裔如仍墨守宋代朱、陆二派大师的思想而讲心性、义理，终日在尊德性、道问学的圈子里打滚，必定成为生活行动的桎梏，向前冲刺的步伐受掣肘。这样的生活意识是落伍的。今日海外华裔要生存又要发展，就要一方面能适应现代生活，又能对当地做出贡献，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共同建设，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那么，我们

的生活意识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应另谋指导途径。宋代独树一帜的学者，浙东学派创始者吕东莱，他的学说特色是“多识前言德行，以蓄其德”。他生在南宋偏安时代，朝廷政治积弊，军事软弱，想借史学以针砭时政，并提倡事功以图恢复。因此他的学术重点偏于史学，讲求实学。他与同时代的永康、永嘉诸子都有往来，对学术风气的提倡有很大的贡献。他人缘好，和二位当代大师朱熹和陆九渊都有密切的交游。尤其和朱熹更接近，两人还合作写过一部《近思录》。他对史学很有研究，治史的目的，是希望从历史制度的变化中，分析兴衰治乱的原因，以作后人的鉴戒；重力行，轻言说，流风所及，便形成一个讲求实际，不喜谈心性的学派即浙东学派。

谁是浙东学派的真正领袖？依据近代史学家何炳松研究的结论，浙东学派的真正领袖是程伊川。浙东学派是程学的嫡系，这一派奉行程氏“学贵有用”的主张。程氏说“百工治其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不可用，学将何为也？”他又说：“穷经



新加坡儒学会成立仪式



国际儒商会聘请庄右铭先生任顾问兼基金名誉理事,并负责新加坡儒商会成立的聘书

将以致用也，今世之号为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这种唯物论观点流入浙东，被朱熹视为“功利之学”，浙东学派早期没有一定的名称和地点，有时叫为“浙学”，有时叫为“婺学”，有时又叫为“永嘉之学”，直到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始定名为浙东学派。这包括金华、永嘉二派，为了缩短篇幅，我现在只介绍这二派的几位突出人物，把他们的思想特色介绍给海外华裔，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浙东学派抛弃朱、陆二派的玄学观点，走的是明经致用的道路。他们激烈反对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成为朱陆学派的反对者。

永康（金华）学派代表人物：第一位是吕祖谦，即吕东莱。他是金华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思想上面已介绍过。吕东莱因过于肥胖，早早去世，只活到四十五岁。这样的天才不幸早死，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件可悲的事情。无怪朱熹和陆九渊诸人都为他死而哭了。朱熹还特别为他而设祭坛，哀悼一番。金华学派的另一位突出人物是陈亮，字同

甫，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南宋婺州永康人。他才气超迈，谈议兵事世局，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写文章更是工巧思捷，下笔千言，堪称金华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陈亮的哲学观点与朱熹相对立，他主张历史研究与实际事务相结合，通过这种观点建立了他的价值论：重事功，重实用，重实物，重实效，重对国计民生的实际贡献。他的功利思想，也是杨雄、王充、柳宗元等唯实思想传统的继承者。陈亮与朱熹的思想前提同样承认人有私欲，但因思想体系及推论方法存在差异，而有不同的结论。陈亮认为人性是自然的普遍人性论。朱熹却认为人性是有圣凡品级的，道德有有无的特殊性或差异的存在。二人都承认“道”这个词，但“道”在陈亮的眼中是与事物不可分的，而在朱熹的眼中，“道”是形而上的“理”存在于一切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之上。陈亮认为义理在功利中，王与霸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毫不讳言功利，并以功利作为理论与评价的依据。（他的解释有近于英国边沁的功利主义。）陈亮的经济思想最

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官民一家”“农商一家”“有无相通”。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字君华，学者称止斋先生，浙江温州瑞安人，生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卒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享寿六十六岁。陈傅良认为宋代赋税太重，横征暴敛，是杀鸡取卵的政策，遂使民不聊生，社会大乱，终至金人南下，使北宋倾覆；而过江之人仍不知改图更张，反继恶承弊，且变本加厉。他认为应改革制度，使中外一体，事权集中，以期彼此相谋，有无相通，前后相守，然后方能达到宽民的目的。朱熹认为他的主张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止斋说“功到成后便是有德，事到济后便是有理”。这是陈亮的理论，也可以说是浙东学派的功利思想的典型。事业及功业能做成功，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可能只是事势的理，未必是道德的理。

永嘉学派另一位大师是叶适，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孝宗淳熙五年进士。平生静重寡言，有雅量，正直刚毅，严于是非之辨，学术

思想均与朱子不合。然于林栗陷害朱熹时，叶适特为之上封事抗言，揭发林栗之奸，光明磊落，时人鲜有可比者。

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透过“事功”去训析“义理”。以讲求实事，实物，实效，实利而经世治民。反对道学家对义理意义规定为脱离个别事物的一种抽象的普遍概念，而认为义理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个体）中的一种规律，从事物发展中呈展出一种概念。这种思维可说是永嘉诸子的思想核心。叶适的学说反对理学家们“自内出”以冥想意料而虚构的天理，主张“自外人”博学力行，借问切磋而识的学问。前者是以道致学，属于先验的；后者为以学致道，是实践的。叶适指斥老庄，是因为老庄有混淆视听、割裂周孔圣学而不正视人间的实际问题。他反对佛学以“悟”为宗，尽废聪明思虑，便一切归之空有。他说穷理要“悟”，居敬要“悟”，一切都靠“悟”，唯独悟不出经国济民、匡时救世，合实用，成事功，而兴大利的理论方法与策略。经世致用而要功利的永嘉之学，他们坚持“凡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这样的观点当然要反对唯理唯心的程（颢）张、朱、陆了。

叶适的经济思想对理财的主张较陈亮、薛季宣、陈傅良等人深且广。北宋的李观、王安石、范仲淹、“三苏”等人对他都有影响，因此财政思想上较其他人士更有深度，他说：“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圣贤贤臣者也，若是者，其上已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

也，此其所以小人为之而无疑矣。”他又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已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已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弗辞，执之而弗置。而

其上也以为君子为不能也。”

叶适的财政思想，颇有现代总体经济的概念，他所强调的“理财”与“聚敛异”，揆其真意，实有政府的良好财政，不该阻碍民间的经济发展之意，而且要尽量帮助民间的经济活动与发展。

总之，叶适之财政与经济思想有承袭自传统者，宽民力，省财用。有受先进影响者，如重生产，如货币论，富人为富国之说；以及允许经济自由之思想，尤其收义利合一之功。



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庄右铭(前排左三)受邀参加



国际儒商学会聘请庄右铭先生为名誉顾问聘书



庄右铭(右三)盛情接待刘海粟大师(前排左一)及梁灵光省长(前排左二)

#### 四、儒学旧观念已难适应华裔新环境

儒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这是不容置辩的史实，海外华裔在各居留地的生活意识，举止行为，自早期移民海外的华裔，尽管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但他们脑子里还是深深地印上儒家的道德观念。这从婚姻礼仪和一切风俗习惯中可以看出。

华裔社会生活意识沿至本世纪，因教育水准普遍提高，知识视野扩大，随着华裔工商业各方面的进展，又吸收前殖民地主人遗留下来的管理技术、科技知识，同时与土著社会密切往来，化除了误解与隔膜。今天的华裔社会生活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要发展能与各族社会并驾齐驱，面向世界，朝时代新方向前进。那么我们要躬自反省，仔细检讨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思维方法。培养我们的处世态度，这就是要我们适应今日世界的新思潮、新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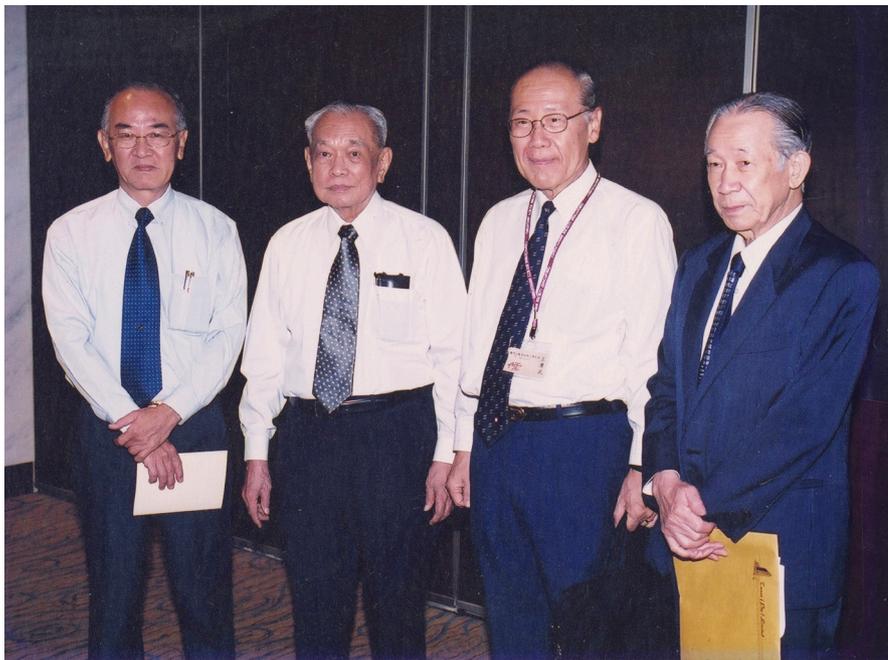
我们历来承受的传统观念、思维方法，是以儒家哲理为中心，加上道、佛二家的宗教混在一起作为生活准绳，

这样的思想观念是保守的、落伍的、消极的。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已发展到最高峰，如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这二位大师苦心婆心教人尊德性道明学，修养成为完人。我们很明白这些大道理，为让每位华裔都在明性义理圈子里下功夫，自以为到了“内圣”的修养境界，肯定不能适应新思潮的“外王”功

夫。

本文所以郑重提出，在宋代儒家学派中，除朱、陆二位大师外，特别介绍浙东学派的思想给我们海外华裔认识，而作一彻底比较：浙东学派思想同样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特色是倡导功利实用的哲学观点，反对朱、陆的理学、心学。浙东学派的思想源自程伊川的唯物论，对义利、王霸之辩，与朱陆观点持对立态度。浙东学派以史学的精神随时代的环境变迁，而求适应的生存条件，他们坦白强调事功，实际不同意朱熹对义利的看法。朱熹很欣赏董仲舒“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观点，把义与利、道与功分开，以为有了利即是不符合儒家的义，有了功即不符合儒家的道，也就是与《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点一致。这样的解释不被浙东派的学者所接受。我认为我们华裔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向浙东学派看齐。

浙东学派的思想一度受朱学的抑制，处于衰微状态，到了明清，经黄宗



庄右铭(左二)与新加坡唐裕先生、著名历史学家王庚武教授、香港名人庄重文先生

羲、万斯同、全祖望及章学诚以迄近代史学家何炳松先生相继发扬光大，浙东学派的精神才又再发出光辉。章学诚强调浙东学派有三大特色：一、反对门户之见；二、学贵专长；三、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浙东学派的诸位大师，虽各有自己治学宗旨，但反对树立门户，主张学派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推服。宋明以来，朱、陆二派互相攻讦，到了清代，变而为汉、宋儒学之争；可是浙东学派从不介入，他们主张在学术上争取朱、陆之长，并蓄汉、宋精华，这是我们所赞许的。所谓贵专家之学，就是贵独创精神的专门之学，贵创造发明，不停留在单纯为前人的著作注释考订上。章学诚作过很精确的论述：“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不得谓专家也。然也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清代浙东史学的几位大师，都是各有所长的专门名家，至于主张学术经世致用，诚如章学诚所说，他认为“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他要求学术研究能与当前社会需求密切结合起来，不要脱离社会现实去闭门造车。何炳松先生的为学、办教育也体现了浙东学派的三大特色，继承与发扬了浙东学派的思想与精神，这里就不赘述了。

## 五、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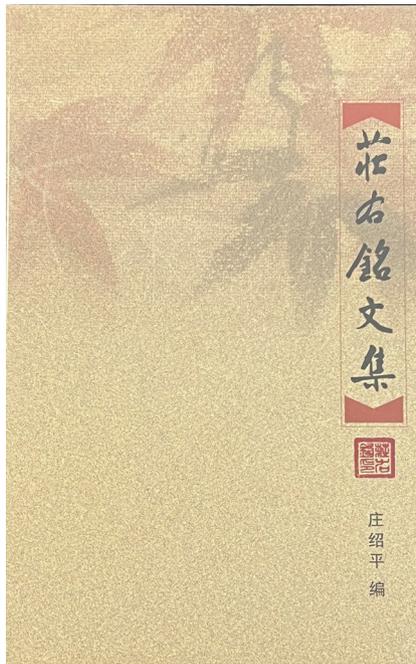
我居留星马六十余年，清楚了僻到此地华裔社会的生活意识至今仍受儒家思想支配着，尽管各代儒家学派的观点有差异，汉儒学与宋儒学不同，宋儒学到了南宋又有朱、陆差异。我们华裔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教人要规规矩矩，言忠信，行笃敬，守住这些做人准则，并不是不对；而是太拘谨、保守、



《庄右铭回忆录》2024年 庄绍平 庄绍文编

消极，太过讲究涵养居敬，会沉浸在淡漠空虚的形态中，因此应特别强调要以浙东学派的儒家思想作为我们华裔的处世为人的指导方针。今日的世界与20世纪初期的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的时代不同，不再有“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看法了。我希望浙东学派的儒家，能给海外华裔以“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增加活力，扩大视野，富于进取心，并吸取东西方文化中有益于我们华裔的养分进而逐渐实现《尚书》里所追求的“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理想世界。

感念何柏丞校长毕生尽瘁于史学和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尤其复兴浙东学派的思想，不但有助于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化；而且他长期担任培养华侨子弟的暨南大学校长，使海外学生有机会直接得到了他的浙东学术思想的教导，学成后回返各自的居留地，无形地为之传播浙东儒学精神于全世界各角落。何柏丞先生的史学家精神、教育家



《庄右铭文集》2011年 庄绍平编

精神可流芳千古。本人不自揣谫陋，率尔操觚，写此什乱芜文，不过是读《浙东学派溯源》后的点滴体会，为的是抛砖引玉，望学术界各位先达能将本文的愚见加以批评指正。

## 爱国、爱乡、爱校的暨南人庄右铭

文 / 邱新民



暨南大学董事会合照，前排右一为庄右铭

暨南大学定于1996年六月十四日举办创校九十周年庆典，校友会总会及九十周年校庆筹委会决定编撰出版定名为《暨南人》一书，意义深长。新加坡校友会接到征文信后，会长盛碧珠、秘书邢济众，坚邀名誉会长庄右铭写一篇参与“暨南人”之列，但他以平日疏于执笔为由，谦辞不写，盛、邢二君乃转邀我以第三者身份介绍他的读书过程、教书生活、经商服务社会，以及爱国、爱乡、爱校等情况。我根据所知，如实写出，供暨南各地校友共识。

我与庄右铭结交四十余载，私谊深厚，既是老同事，又是小同乡，他的学养、处世为人和他的家庭情况，我都了如指掌，前年我已写过一篇“我所认识庄右铭夫妇及其子女”一文，这次再受命写一篇他是一位“暨南人”，相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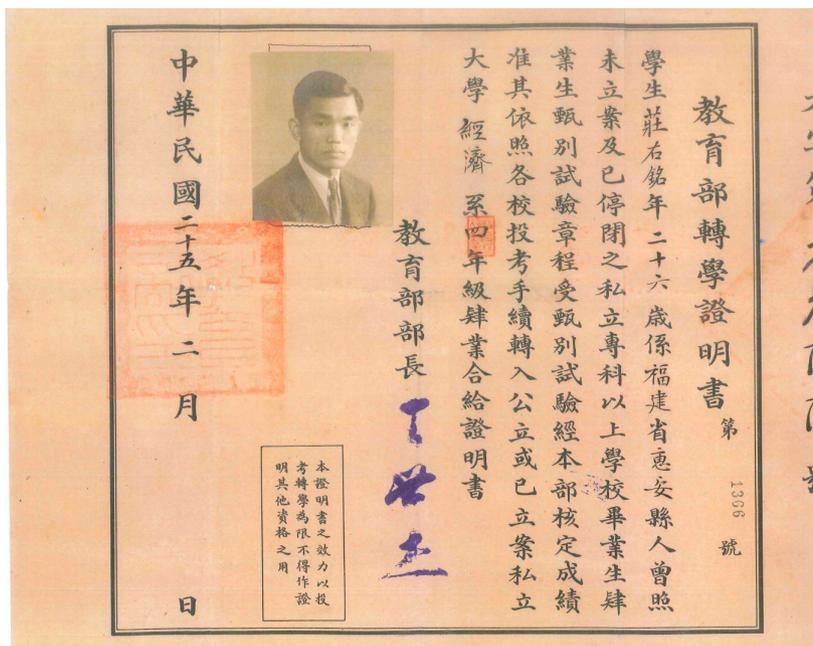
会有偏差或误导的。

庄右铭原籍福建惠安山腰乡，1908年出生，幼失怙恃，贫苦无依，赖其叔父抚养并送往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南渡星马谋生。1929年，世界经济不景气，波及当地土产价格大跌，树胶每担只值马币八九元，大小商店均濒临倒闭。右铭鉴于自己孑然一身，无所牵累，留滞在此长夜漫漫的凄凉市镇，蹉跎岁月，毫无意义，遂决定往沪寻求学机会。他于1931年夏由巴生港口买楫赴上海，与暨南结缘。他选读理科，希望能在安静环境中，循序打好科技基础。不幸从1931年开始竟是中国国运多灾多难，面临危亡的年代。秋季开学不久，9月18日突然发生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部队袭击东北军北大营。继又进驻沈阳，时东北军全体官兵奉命不抵抗，短

短几天内日军便占领东三省，时东北最高司令官张学良亦不知所措。东北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震怒，学校停课，学生参加军训，女生加入护士班，并请名流演讲，灌输爱国思想，提高抗日情绪，随后全上海各大学学生集中乘火车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向日宣战，查办张学良，援助马占山等。他参加了两次，第一次集中在军校大礼堂听蒋介石委员长训话，隔日便返。另一次集中在明孝陵官邸，那时为中央政府行政院所在。大家露宿三昼夜，挨过寒冷饥饿，坚持要见行政院长（蒋介石兼此职），要求他对抵抗外侮作明朗表态，于右任、戴季陶、张治中等先后接见他们，但劝散学生回上海都无效果。最后蒋介石终于亲自和大家见面，他训斥学生不该再来南京，跟政府为难，搞乱政府治国苦衷，称火车已预备好，要学生明天早晨通通回去上课读书。大家此行又是落空不得要领而告结束。那时学校处在半停课状态，学业损失很大。寒假期间，外表相当平静，大家希望开学后好好读点书，不料1932年1月下旬，上海郊区又紧张起来，那时十九路军驻防真茹一带，士兵忙着挖战壕，过后中央军精锐部队八十八师亦开到了，终于1月28日晚上跟日本派遣军打起来，学校又不能依期上课，战事相持一个多月，最后日军从太仓浏河包抄登陆，中央军被迫后退，中日双方签订屈辱的淞沪协定。时真茹是双方军队交锋的战场，学校当局分为上海租界、苏州、广州三地

上课，读书生活风风雨雨，很不正常。那时庄右铭内心开始担忧他自己的读书问题，他体会到读理科，书本上的理论要与实验室配合，而在播迁不定、一曝十寒的环境里要达到名符其实，完成理科学业，实在是难乎其难，经仔细深入考虑后，他意识到改读别的学科，比较不虚幻而实事求是，终于决定学期结束后，离开暨南转到中国公学大学部插班政治经济系，内地学生多，国文程度较高，他有形无形从中得益不浅。他在中公读来毫不勉强而感有心得，每逢考试，均列前茅，直到毕业为止。

他在国步艰难，读书生活不安定环境中离开暨南，但他回忆到作为暨南学生时期里，不但不是毫无所依，而且是受惠甚多，毕生难忘。暨南是国立学校，经费充裕，容易以高薪聘请名教授名学者来校任教。上课时他总要抽时间前往听课，特别是从文史、社会学等学科，讲学时所得教泽最多。由此而领悟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更奠定了思维逻辑的最新观念。沪上爱国名流，时常受邀来校演讲，亦吸收不少关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知识。总之，他从名教授、学者、爱国名流们的言教身教中得到启发，引导他走上求学和做人的正确道路，并且永远牢牢记住。他对暨南母校亦一直凝结着浓厚感情。他离母校已六十余年，平日与星马各地校友仍保持同宪亲切友谊，并不断关怀母校复办后的发展壮大情况。1986年，新加坡校友会会长源则金去世，庄右铭被推继任会长，他率领校友十余人往广州参加母校八十周年校庆，赠送艺术品并献旗纪念。续后又多次独自到广州访问母校，每见校容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学生成绩斐然可观，他内心无比高兴，并与母校多位正副校长、教授、董事部秘书等建立深厚友谊。80年代后期，他访问母校时，顺便留在华侨医院检查身体，早晨在暨南



庄右铭先生大学毕业证书



新加坡暨南大学校友会会长庄右铭先生和会员合照

校园内散步，天高气爽，心旷神怡，他一时兴会，顺吟一首小诗：“漫步深秋径，晨曦沐浴身，仰观大宇宙，喜是暨南人。”后来他把这首诗写成一张条幅赠送给当时大学办公室秘书，现任香港暨南大学基金委员会秘书李钜诚先生。当时他偶然脱口自称是暨南人的诗句，与这次校友总会编撰暨南人书，大家写作时的心境，很可能有暗合的感觉。

庄右铭目睹近百年来中国国势积

弱，内忧外患，又常常见到洋人在国内目无法纪，横行霸道，无不怀恨在心。他定居海外，已成为外籍公民，仍认为凡属炎黄后裔，应有回馈报国之责。记得卅年前东南亚新独立国家与中国大陆北京政府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时期，马来西亚境内中国银行，吉隆坡及檳城二地相继关闭，新加坡分行停止营业，预料只是时间问题；那时忽因新加坡向吉隆坡中央政府争取权利，认为



庄右铭先生捐建的泉港一中和熹堂



庄右铭先生捐建的泉港区山腰第二中心小学(原埭港小学)教学楼



他不仅在新加坡倡设庄氏公会和惠安公会奖学基金会，为推广海外华文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不忘造福家乡——捐建泉港一中“和熹堂”、山腰中心小学葦照教学楼、涛声馆、电教室，助建泉港二中旅星教学楼，捐助泉州黎明大学等，捐资金额逾四百多万元人民币，获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

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所共有，各族应共享平等地位。结果新加坡被迫脱离而独立，新加坡中国银行亦由此可继续营业。但知那时新加坡分行现金库存不多，总行又不调汇过来，存户要兑现，庄右铭与中国银行的关系，只是普通客户，亦未享有信用透支贷款优待。他在传闻中得悉中国银行在困难中度日，深感不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之翌日，庄右铭绝不思虑，开一支票二十五万元存入中国银行，据行内主管人透露，那天存入银行客户以庄右铭的数目为最多，其次为吴某十八万元，再次为杨某十万元，时分行经理张纪歆不觉惊叹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实庄右铭无他企图，只是略表爱国情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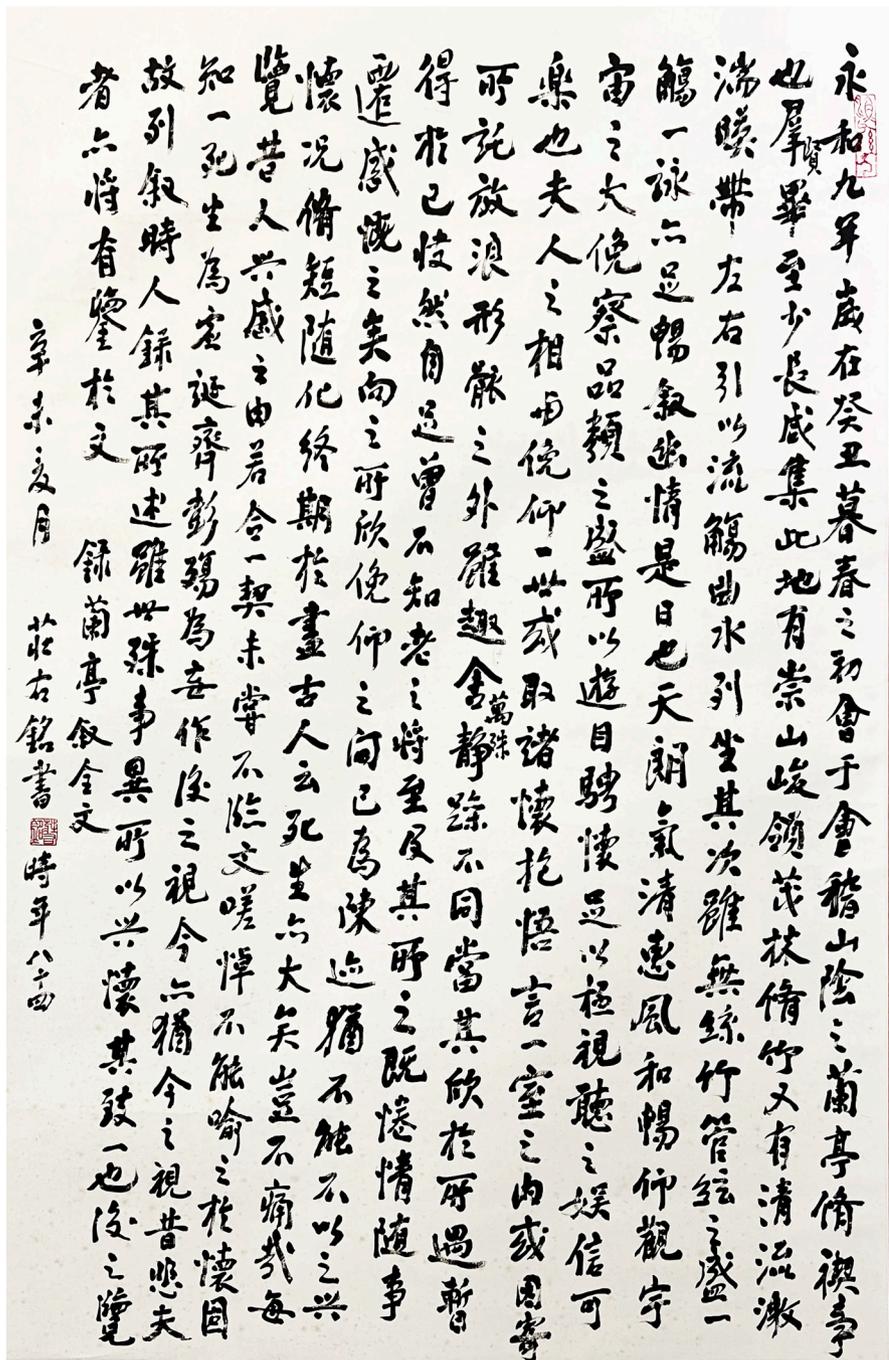
庄右铭定居星马前后近七十载，他在上海完成学业后，南下广东受聘任和平县公立中学教师，翌年返星，相继执教星马二地中学多年。1949年，他因家计离开教席转入商界，可取的是不忘本，仍续参与文教事业工作，他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及南洋初级学院董事垂四十余年，又兼任中正中学董事部义务秘书达卅二载，最后始以年老告退。十年前，他鼓励前数位擅长书法同学，成立乐龄书画会，弘扬传统艺术，他任两届会长后始告退休。近年来，他年老思乡，决意量力捐助故乡学校建设。1992年，捐人民币五十六万元，连同二位族亲凑成人民币一百六十八万元，建造县立惠安二中，包括四十八间课室的教学楼一座。教学楼1993年9月竣工，得全国归侨联合会主席庄炎林先生主持落成典礼。1994年，他捐人民币五十万元在他故里盐场中心小学扩建教学楼课室十二间，该校舍于1995年5月落成。又因本乡另一中心小学是他的母校，众校友集资扩建校舍，他也捐献人民币十万元，以促进早日完成计划。1993年，庄右铭

受聘任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董事，1995年春，政府拨地四百亩，作为新校舍园地，董事部规划建设蓝图，开始积极筹款。庄右铭远居海外，未能参与策划，但亦不欲徒挂虚名，置之不闻不问。他联络该大学前校长、现任名誉董事长梁披云先生，请代转达大学当局，他认捐人民币五十万元，聊充添购砖瓦之资，望黎大建设大计早日实现，是他内心唯一愿望。

庄右铭的禀性为人和处世作风，我了解相当透彻。他出身贫苦，读书生活亦因国运艰危而崎岖不顺，由此而养成卓牢不拔的意志。他生活简朴，待人忠厚，好读书，泛览文史哲学及诸子书，殷勤于宋明理学，特别服膺浙东学派吕东莱、陈亮、叶水心等所强调的功利学说，他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海外儒学要发扬浙东学派精神”，刊入纪念故校长何炳松论文集内，以阐述其读书心得。

还有值得介绍的，他的家庭教育很成功，引起新加坡友好赞不绝口。他共有九位子女，除长女爱好艺术，入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专攻钢琴外（不幸前年去世），余者八位俱完成新加坡及英美著名大学学业，总加起来，一家有三博士及九硕士，最幼儿子荣获英联邦奖学金入剑桥大学读电子博士学位，将于1996年结束，届时又再加一博士，殊不寻常。

庄右铭已年登八十八，早已卸弃管理生意业务，家藏万卷书，闲来无事，坐拥书城，宁静致远，读他所想读而未读的书，谋他所要为社会服务，应做而未做的事，澄心凝思，稳步行事。我们大家应共同祝他长寿，看他贡献社会的愿望，次第落实完成，这篇文也就此搁笔停止。（原标题为《我写新加坡一位暨南人——庄右铭》）



庄右铭书法作品：《兰亭序》

## 饮水思源 自强不息 ——华侨中学校董庄绍平



庄右铭全家照(1968年)从左起:本惠、敏惠、修惠、端惠、谢金珠(夫人)、庄右铭、绍川、绍懿、绍平、绍文、绍震(前)

世界无难事 唯在毅力与责任耳  
华中是一面镜子，见证了精神塑造的意义和价值。——庄绍平

在华侨中学董事部的会议室，庄绍平先生和我回忆华中的艰难创校史和辉煌百年，他说，华中一路走来，见证了精神塑造的意义和价值，华中精神的真正内涵和力量就是饮水思源、自强不息。它的深层含义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和凝聚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长久发展，必须有精神支撑，把塑造人的精神力量放在首位。

1913年5月，陈嘉庚在家乡集美给中华总商会写了一封信，吁请商会建议组织一所中学，从历史记载上看，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回应。

1918年，同德书报社派代表去见陈嘉庚，商量创办中学的事情，陈嘉庚还是愿意担起开办中学的任务，于是开始了积极筹备。

1918年6月8日，陈嘉庚联合马六甲培风学校、新加坡本地的端蒙、养正、启发、爱同等一共15所小学的总理，在《叻报》发布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通告。6月15日，陈嘉庚假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55人，皆是各帮的领袖。陈嘉庚慷慨激昂地说：“世界无难事，唯在毅力与责任耳……公益义务固不待福而后能进。如遇待福，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

董事会在陈嘉庚领导下筹得约50万元，以5万元买到小坡利民律（现尼文路 Niven Road）洋房两座修改成校舍，黄



庄绍平先生在嘉庚堂讲述华中的故事

炎培聘请湖南长沙人涂开舆为华中的第一任校长。

我请庄先生分享华侨中学创办的意义是什么，庄先生说用一句话概括：南洋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 南洋教育的升级

华中的创立标志着南洋教育的升级，由小学阶段进入了中学阶段，意味着华人各帮打破地方主义，放下地域之见在办教育这件事情上团结一致，为南洋各地的华人子弟创办中学。

庄先生说，在这之前，新加坡华校基本上都是各族群自己创办，招收本族群学生。华侨中学突破了 this 界限，使得华侨中学的诞生，不仅仅在教育方面，在促进族群团结、融合、增强社会

凝聚力方面更具重要性，无疑是南洋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访问华中并发表了演讲，肯定了华中的意义。1922年12月，华中迎来了第二任校长——北京大学理学士鲁士毅。1923年，学校搬到武吉知马路，也就是现在华中所在地。庄先生说，从当时情况看，武吉知马校园离市区很远，交通也不方便，可是陈嘉庚和董事们深具高远眼光，让学校拥有了一片广阔的土地。

庄先生解释，陈嘉庚在那时就有创办一所华人大学的想法了，因为东南亚的华侨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当地没有大学可读，只能到中国去，如果读英校费用太高，普遍读不起，这也就是后来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陈嘉庚也积极支持的原因。

### 校园回荡自由思想之风

1926年，陈嘉庚决意辞去总理一职，于是华侨领袖选出华中的第一届董事会，由陈延谦先生担任总理。1928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接任总理，捐建宿舍和学校大门，因为大门的题字问题和陈嘉庚对簿公堂，由此也看出陈嘉庚对华中的感情。1930年，董事会把总理改称为主席。1929年，中国“五四”作家老舍来校任教，留下了著名的小说《小坡的生日》，影响广泛。

庄先生说，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末，是华中颠沛流离的时代，各种事物纷扰并被殖民地政府勒令停办。但是学校董事会没有放弃，积极争取，在1934年1月复办。李光前出任华中董事会主席后，还清了学校欠华侨银行的款项7万元，以巩固学校的经济基础。

李光前任华中董事前后20年，贡献巨大。1934年以后，华中采用了新的校训“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出《易传》中的《象



庄绍平在新加坡国会委任官委员宣誓仪式上

传》。意思是：宇宙不停运转，人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地前进，这有别于之前的“明志力学，爱国乐群”，是从更高远的人生理念，鼓励和教育学子。

庄先生说，华中从1919年3月开学到1936年，17年共换了九位校长，因为更换校长非常频繁，未能塑造华中的底气，因此学校基础欠巩固。1936年，薛永黍校长上任（1890~1951.11.10），薛校长是金门人，福州英华书院毕业后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获教育学士，之后又考取历史硕士学位。薛校长在任11年，结束了学校经常更换校长的局面，稳定了华中的局势。

庄先生赞叹地说，薛校长可以说是华中转折点的灵魂人物，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其治校方针，注重课内和课外生活的调剂，注重人格感化，管理严格。薛校长有点像蔡元培先生的精神，对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学术主张的教师，只要是严肃教书，教学质量高的，他都团结。因为李光前大胆放权，胸襟广阔且有远见，薛校长治校有方，推动了学校的迅速发展。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华中校

舍被日军所占，学校停办。

1946年，华中在战后遭严重破坏的烂摊子上勇敢地站立起来，复校以后薛校长塑造了校园思想自由的风气，把华中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948年12月，薛校长辞职，由郑安伦校长（1910—1998）接棒。郑校长是教育界知名人士，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校长，他在1948年至1968年掌校，在华中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反英国殖民主义

1950年5月31日，英殖民地政府和教育局带领荷枪的警察突击华中。在检查当中，搜到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于是取消了华中的注册，华中停办两个半月，当时李光前不在新加坡，回来后继续和华中董事会多次向政府请求，最终接受了政府提出的辞退教师、开除学生、关闭宿舍等等条件而复校，这也就是“五卅一事件”。复校后，董事部改选，李光前蝉联主席。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自治邦政府首届立法议会大选。在这天，全新加坡人民第一次真正地选出了自己的民选代



百年校庆——华侨中学校园航拍(图: 华侨中学珍藏)

表执政，新加坡脱离了殖民地的束缚，这时华中开始了四年制中学。

这段时间的主旋律是反英国殖民主义，是华中和新加坡社会脉动最贴近的10年。华中的学生以保护母族文化和有左倾色彩的理念一直抗争，在国家观念的形成当中，华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为新加坡的建立和奠定国家意识做出了贡献。

### 确立国家意识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郑安伦校长在毕业特刊中特别地勉励同学们：

一切建设的工作都得加紧进行和重新开始，因此，新加坡急需更多的干才来负起各方面的工作，只要各位有充实的学问优良的品行，而又能献身国家的精神，不怕没有替国家服务的机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中对学生国家意识的培养和服务献身精神的树立十分重视，建国伊始，学校便开始引导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奉献精神。

1979年，教育部实行特别辅助学校计划，从全国遴选9所华文华语为媒介的中学为特选中学，华中是其中的一所。特选中学的任务是保留华族的优良

传统文化，中文与英文同为第一语文水平，为国家培养双语人才。这也正是新加坡精神的切实贯彻。

### 首任校友校长——杜辉生

1986年，杜辉生校长宣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华侨中学的教育哲学（英文为“win-win”）。他阐明：己立己达是校训自强不息中的小我，立人达人则是自强不息中的大我。杜校长寄希望华中培育的学生除了具备自强不息的精神，还得推己及人帮助及提携周边的人，回馈社会，以达共赢。杜校长以其旷达的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学理念，丰富和完备了华中精神的内涵。

杜校长的这一倡议，进一步深化了华中校训的社会意义。1993年，杜校长又提出世界级中学的概念，矢志把华中带向另一个高峰。庄先生感叹：杜校长给了华中更高的目标和格局。为华中后来勇敢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播响了战鼓。今天华侨中学在中国广州设立了第一所深具华中精神和理念的海外中学。

2021年3月21日，广州新侨学校在广新知识城国际科技中心召开创校新闻

发布会。作为中国与新加坡在基础教育领域合作的标杆项目，广州新侨学校总投资额预计13亿人民币，目前已经开学。庄先生说，他深度参与该项目前期的工作，该校是中新两国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是目前唯一的国际化学校，同时也是新加坡华侨中学校群的首个境外成员，将秉承华中校群办学模式，依托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群雄厚的办学实力，以培养“敢为人先的栋梁之才”为己任。融合国际文凭项目理念、新加坡优秀教育理念，打造学校独特的融合课程体系，彰显了华侨中学的高瞻远瞩和宏大格局。

### 资政和总统都赞赏的学校

庄先生说，华侨中学一直备受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赞赏，1994年75周年校庆，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任内阁资政，为华中第一期扩建校舍揭幕。李资政表示：华中在新加坡历史上将永远占有特殊的地位，并表扬华中能适应时代改变。当天的华中校庆晚宴主宾是新加坡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他也是华中校友，当天，王总统为新礼堂嘉庚堂揭幕。华中校友胜任总统，不仅是华中的骄傲，更是对华中的鞭策和鼓励，也是华中精神的体现。

1999年3月19日，华中钟楼被新加坡政府列为国家古迹。它不仅是武吉知马路上的地标，也是华中精神的象征。同年，华中自办的资优班表现突出，正式被教育部接收，华中成为新加坡国家高才教育中心之一。

### 开办直通车和国际学校

2002年，华中再次向教育部争取开办六年直通车综合课程。在积极争取之下，一年后获得教育部批准。

华中的直通车直通世界各地，2003年1月10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为

华中寄宿学校揭幕。2003年，董事部接受经济发展局邀请，在12月8日向教育部提呈开办私立华中国际学校建议书。2003年，华初获得“新加坡素质奖”以及“人力资源发展奖”两大认证，也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最佳治校奖”，以及三项教育部颁发的“持恒成就奖”。

2005年1月1日，华中和华初正式合并，采用六年制直通车课程，这是华中系成为自主学校后的另一个里程碑。

### 培养栋梁追求卓越

庄先生说，学校的愿景是成为培养领袖的世界级学府，校训一直推崇自强不息，并开展多项领袖课程，成立领袖培训基地，打造新加坡乃至东南亚青年领袖的摇篮。2005年1月，华中董事部成立的私立中学华中国际学校（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District）正式开课，华中的格局和前景更上一层楼。

2005年，华中宣布2600万元扩建校计划，教育部提供1300万元，余下的1300万元，由校方自行筹集。

2017年5月，华中荣膺了政府颁发的公共服务卓越奖（Public Service Premier Award），这项大奖是颁发给在公共服务领域表现杰出的单位和机构，华中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学府。

### 华中校友再次掌校

庄先生说起华中的历史，条条清晰，历历在目，特别谈到华中的第二位校友校长彭俊豪，2018年1月，彭校长出任第22任校长。彭校长在1992年毕业于华中，1994年毕业于华初，是新加坡教育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得主。掌管母校之前，他在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母语处担任司长，获得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深造。对跨文化学习有自己的观点，

他主张掌握两种语文，更要深层理解多种语言背后的哲学。在这次华中的专访中，庄先生极力推荐专访彭校长，非常幸运，通过多次沟通交流，彭校长抽时间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对彭校长管理学校理念和教育哲学，有了广泛深度的了解，特别是他执掌华中时的措施和实践，让我们了解到灌输和培养年青一代精神和理念的重要性。

庄先生说，精神的培养是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仿佛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是最坚固和坚强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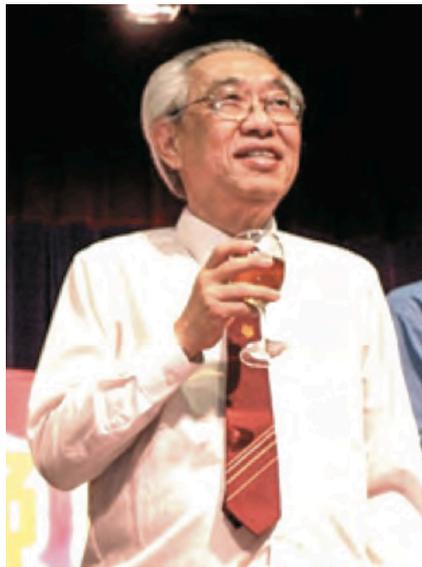
庄先生几十年公共服务经历，对华中的感情和经验非常丰富，他总结华中为什么能够获得更多的筹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慈善。他说先贤们创立的奉献精神 and 慈善风范，始终被保持和发扬，从表面上或许看不出来，可是华中成功的背后却是慈善公益精神、国家认同和族群凝聚力的最好表现。

### 慈善概念——饮水思源

回顾华中的历史，是先贤们艰苦创业的历史，饮水思源是华中学子对学校最基础的爱，也是一个人最基础的价值观念。

庄先生说，华中的精神教育非一般学校，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特别注重感恩和回馈，饮水思源是自强不息的动力和推手，因此学校把校史教育放在开学的第一天，也放在毕业的最后一天。人文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学校不应该只是教授专业知识，还应该灌输学生爱国理念和国家意志，才能够培养出为国献身的栋梁之才。

2019年3月19日，华中举办“华侨中学历史文化之旅”先贤事迹展览。这个活动由华中和晚晴园合作举办，主题为“润物细无声”饮水思源，回顾先贤对新加坡教育的贡献。活动主要围绕陈



杜辉生校长（掌校1978—1999年）是首届华中校友担任校长。1978年12月，杜校长到华中报到，他是华中的第17任校长，成为华中精神的灵魂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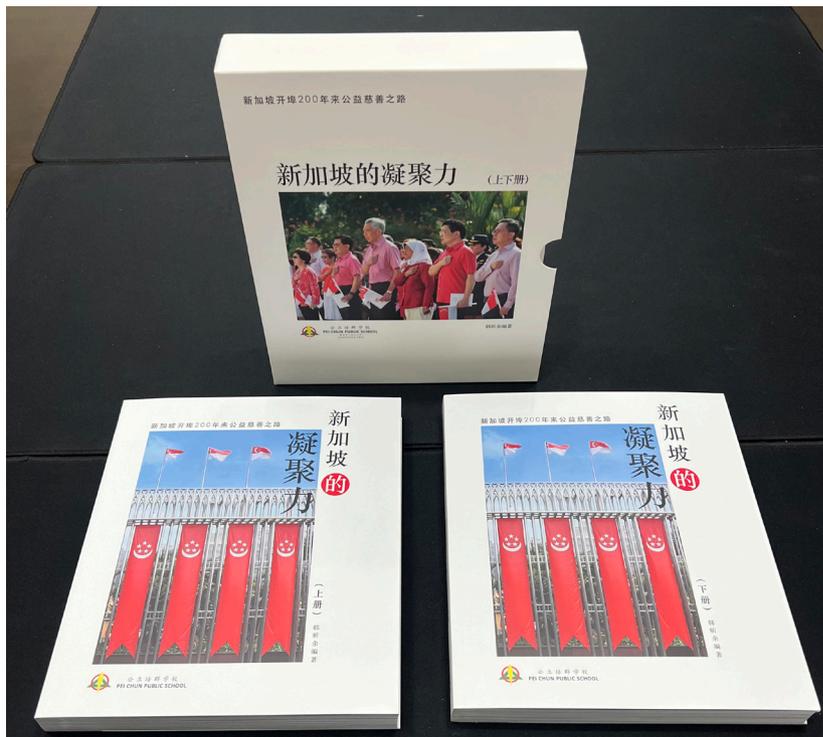
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先贤，回顾他们创办学校的初衷和艰辛。当时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先生和陈六使后人魏达人先生，也邀请我一起出席了这次展览会。我和庄绍平先生一见如故。

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担任这次活动主宾，马炎庆也是华初的学生，由他担任主宾特别有意义。致辞中，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华中的学习生活为他后来的发展和进步奠下良好的精神文化基因。他说：参观华中历史文化之旅，是追寻杰出先驱人物的足迹，了解前人创业的艰辛历程，以及他们热心公益造福社会的伟大功绩。他相信饮水思源回顾历史，会让参观者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美好从而自强不息，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大众。

### 校庆百年 辉煌永恒

2019年3月21日，华中100周年校庆，庄先生又邀请我前往。参与华中100周年欢庆的喜乐与振奋，真是百年一遇的时刻，见证历史的神奇与力量。

庄先生说，百年庆典，其中一项重



2023年，庄绍平独资赞助出版《新加坡的凝聚力》

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与发扬，回忆先贤，肯定他们对华中的贡献，展示新老校友对母校的付出和缅怀，目的是希望今天的同学牢记学校艰苦的创校历史、自强不息的精神，饮水思源，更好地回馈母校、贡献社会。

### 大雨滂沱 激情不灭

华中百年校庆晚宴，大雨滂沱，也未能阻止华中学子们前往母校欢庆的激情和脚步，泪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当李显龙总理致辞，谈到华中的历史，阐述华中与本地华校如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终于走向成功的历程，总理几乎哽咽，台下校友多少人泪目，感慨万千。

李显龙总理说：

“二战后，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全世界殖民地刮起争取独立自主的风潮，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在新加坡很多关心国事的华校

生，一方面受到时代的感召，另一方面要反抗殖民制度下不公平的对待，选择投身反殖民抗争运动。华中校园当时就成了反殖民、反政府抗争的历史现场，有不少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

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年的各种抗争，如今都成了历史的一页。

“后来新加坡独立，华中纳入教育部学校体系，也几次转型。1970年代，华校收生率逐步下降，面临关闭危机，当时建国总理李光耀认为华校有优良的传统，并且肩负着传承华族文化的责任，如果消失，将会是新加坡一大损失，因此提出了特别辅助学校计划，让华校以新的形式保留下来。”

### 总理的鼓励响彻夜空

耄耋学子们再一次亲近母校，回到那个风雨和青春交织的年代，多少往事与回味，多少壮志与理想，一一涌上心头。我的同桌是两位毕业40多年第一次回校的老校友，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他们眼中含泪，不断鼓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燃烧的岁月。

“华中必须继续为国家社稷养德育才，维持高学术水平，并且也确保华中人了解他们扮演的角色，积极参与社会。”

李总理的鼓励与寄望，在热烈的掌声中久久回响于华中璀璨的夜空。我的心情也无法平静，这天晚上，我不仅仅是看到华中的强大，那些浑身浇满雨水的校友，怀揣着一个永远也无法浇灭的爱心，更深悟华中精神的伟大。

### 精神和信仰的力量

和庄先生相识两年多，每每见面都谈及华中精神，仿佛我也成了一个华中人。2019年10月，首届新加坡慈善论坛，庄先生是演讲嘉宾。我和庄先生谈起讲题，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就谈华中筹款的事情吧。我在董事部服务多年，经常遇到同仁、朋友问我，你们华中筹款为什么这么容易？你们董事会有什么妙招吗？这个话题谈的不是筹款，而是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

其实我们的筹款也是不容易的，看看华中的历史，从创办到几经挫折发展到100年的今天，也曾因资金的拮据而停顿。作为民办的学校，靠的就是董事们辛勤地筹款和慷慨的捐助。

创校之初，因为资金的问题，董事们亲自上街募捐，每周五都是上街劝捐的日子，副董事长林义顺（Lim Nee Soon，1879年11月12日—1936年3月20日）亲力亲为，留下不少佳话。但是先贤们的艰辛努力和无私奉献精神才是内核，成就了今天华中的筹款。因为先贤们的精神已经扎根于华中董事和每一位校友的灵魂，为了使华中灵魂不灭，精神永在，大家都齐心协力，绝不落后。

庄先生说，学校的董事会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先贤精神的保护和传承，每一

位校长也积极配合董事会，不忘初心，在各个层面贯彻塑造，深化华中精神。

庄先生跟我讲了华中钟楼的故事，讲了地铁命名的故事，华中百年美术展，他也谈到《百年华中情》这本纪念文集，每一篇文章、每一张照片，每一张画作，都是华中成长的真实写照。

### 100年屹立不倒

访问中我特别向庄先生提及，纪念华中建校100周年晚宴，主宾李显龙总理说：华中经历风雨与挑战，100年屹立不倒，请庄先生谈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对庄先生说：李总理说，华校肩负着传承华族文化的责任，华中如果消失了，一定是新加坡的一大损失。作为华中校友、董事部副主席，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庄先生很爽快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还是华中精神！

华中自创校就十分注重学生精神的培养和塑造，创校先贤都是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他们的奉献精神始终主导着华中的价值观，尤其是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关注和高远的格局，无论从学校的角度还是学生的角度都奠定了持久发展的基础。

### 华中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

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在校训和校歌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代一代华中的学子们身上，包括他们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精神风貌等等。

学校的价值观“饮水思源”和“自强不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鼓励自我成长，不畏艰难自愿奉献，服务社会和大众。杜辉生校长发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教育哲学，由自身推及他人，这不仅是一种博大的包容和奉献，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建立。

### 华中人的社会责任感

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中学生一直以来都积极投身于社会，参与社会，关心社会问题和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从历史看华中一直与新加坡的发展脉搏相呼应，有时尽管带来了波折，却让学校和学生在波折中成长起来。

华中创校先贤都是具有慈善奉献精神的社会贤达，他们关注大众，服务社群，以身作则的精神是华中学子的楷模，引领着学校不断地融入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这也为华中培训领袖和社会栋梁这一愿景打下了基础。

华侨中学从创建至今培养的政治人物数不胜数，有总统、部长、议员，有教育家、学者，科学家、律师、医生等等，更培养了一大批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的普通华中人。

特别是华中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是每一位华中人的骄傲。

华中的校长、老师虽然离校了，却把最深厚的感情和寄托留给学校，留给国家未来一代。陈龙得纪念基金、郑安伦奖学金、郑安伦薛永黍模范生奖、杜辉生书籍奖、庄昇涛纪念基金，点点滴滴，凝聚着先贤的深情厚望，更反映了华中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饮水思源，以及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大我人生哲学。

### 老校友的华中情—寒川

我和庄先生谈到《百年华中情》这本书，说起主编寒川，想起去年访问寒川老师特别谈到这本书的写作。寒川老师70高龄了，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现任新加坡、印尼、台湾、中国十多个团体的顾问或理事，经常受邀参加海内外文学会议，担任多项海内外文艺创作比赛评审，2004年荣获印华作协颁授“印华文学功勋卓越奖”，出版各种著作20多本。他说，当董事部把主编这本

书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他提到：“不是没有犹豫，真的是不能犹豫，母校庆祝100周年华诞，这么重要的工作，能够交给我，这是董事部对我的信任，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辞，而且我感到非常的荣耀，当然，我也知道责任的重大！”

寒川老师说：我必须做好，做不好对不起母校和校友们。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就是饮水思源，这正是我报答母校的好时机。

寒川老师是新加坡活跃的文化名人，可最近几年，因为身体状况，他逐渐卸下了多间机构的领导职务。他还挤时间编辑印华日报“文学版”，每周一版，向全东南亚甚至全球组稿，已经够辛苦了，又欣然接受《百年华中情》的主编，正如他说的“因为我是华中人，自强不息是我们的精神！只要我能够挤出时间，我的生命还允许我工作，我绝不说‘不’”。

我和寒川老师认识十几年了，他身上体现的朴素又坚韧的华中精神，常常令我赞叹不已。庄先生说，我们董事会考虑了几位校友，最后决定让寒川做主编，尽管他年龄比较大，身体也有病，但大家都是校友，非常了解他，认为他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抚摸着面前的精装版《百年华中情》，我知道庄先生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情不自禁地说：“这就是华中精神最好的写照。”

寒川老师正是我见过的无数华中人的优秀代表。华中精神根植于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对社会的那份责任心和感恩回馈的情怀，激励着他们不断地奉献，从无怨言。

### 华中精神的现实意义

庄先生看着我认真地说：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有怎样的精神和归属感？



华侨中学园(图:韩昕)

如何与社会和群体保持互动和共荣? 华中的历史回答了这个问题。

华中是先贤捐款创建的, 100年以来, 学校一直将先贤的慈善公益精神, 根植于每一位学子的灵魂和世界观, 学生们走出校门, 走向社会, 便将这种精神带到每一个岗位和领域, 特别是带入自己的生活 and 人生, 培养自己的下一代也发扬传承华中的精神, 子子孙孙永远弘扬, 对社会、国家、社区、家庭、个人都功不可没。

塑造完美人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重视道德教育和实践精神, 困难面前不畏惧, 成功面前不自傲, 这正是新加坡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华中见证了新加坡的成长历程, 为新加坡教育和社会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我请教庄先生, 会不会有人为先贤们都成为过去了,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的转变, 华中历史将成为翻过去的一

页?

### 继承发扬先贤精神

“先贤的精神一定要继承, 要在点点滴滴中灌输。”庄先生毫不犹豫地说, “因为这是华中的根和灵魂, 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翻过去的一页!”

庄先生还对我说: 你访问校友校长彭俊豪的时候, 体会会更深, 因为他是华中培养出来的, 会详细告诉你华中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实践和运用。

学校秉持向学生灌输理念和精神的一贯做法, 尤其是发展迅速的互联网时代, 如果不用先贤的精神和文化去占领学生的思想, 其他的东西就会去占领, 包括非正面的思想,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将影响新加坡下一代的培养和成长, 学校一定要担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特别是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多元种族和多宗教文化, 塑造国家意识、强化

国家凝聚力和国家精神更加重要。

### 华中精神的效忠

庄先生也和我谈到效忠, 他说移民国家常常面对效忠的问题, 过去新加坡是殖民地, 效忠的是祖籍地, 新加坡建国了, 有了自己的国家, 国民就要树立本国的国家意识, 树立爱国主义精神, 全心效忠新加坡。因此公民教育非常重要, 学校的历史也反映了华中一路走来的足迹, 牢记历史, 就是为了更好地明确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先贤的贡献和付出正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自强不息, 饮水思源, 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精神的支撑和价值内涵。

教育是立国之本, 学校的任务体现了学校发展的方向, 访问彭校长后, 我对华中精神在学校的贯彻执行确实有了更深的了解。彭校长的教育哲学和掌校成果正是华中精神最有力的体现和见证。

### 感恩与铭记——陈嘉庚地铁站命名

华中校园内的地铁站命名为陈嘉庚地铁站, 今天仿佛是理所当然, 在这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虽然前几年也隐隐约约记得报纸上有关于这个地铁站命名的投票广告, 并没有太多关注。当庄先生和我谈起地铁站的命名, 我才知道这个过程并不简单, 体现了华中对创校先贤的感恩和铭记, 更是华中精神保持和传承的最好写照。

《百年华中情》有一篇文章是时任华中董事长李德龙先生写的《陈嘉庚地铁站的命名》, 文章不长, 我很快就读完了, 命名的过程写得简单也详细, 但是其中的曲折却没有直言, 而是掩藏在文字之中。

当时学校内有一条未命名的私人道路, 一端是武吉知马路上靠近公爵夫人道的大门, 另一端是接近南利道的大

门，中间是现在已列为国家古迹之一的华中钟楼。在与陆交局官员多次洽谈后，又在SCH董事会赞助人大会和学校校长的首肯下，我向街道和建筑物名称委员会SBNB提出申请，将这条道路命名为陈嘉庚道。SBNB批准这项申请后，我们随即向LTA和SBNB提交了将地铁站命名为陈嘉庚站的建议。

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当时埋下的一个伏笔。

事实上，陆交局当时已经拟出两个方案，即以学校附近的道路名称为基础的：Watten Station和Duchess Station。重要的节点来了，文章中说：

“当时政府的一贯做法是，以地铁站周边的道路和公共场所名称，来决定地铁站的名称。”

这就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华中董事会在这之前要把那条没有名字的路命名为陈嘉庚路的原因了，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政府的规定申请地铁站的名字为陈嘉庚站。因为政府已提出了两条道路来命名，而华中提出了另外一条道路。“最后的结果还是要通过LTA/SBNB设立和指定的网站，让公众投票遴选，地铁站将以投票胜出的选择命名，过程必须是透明的。”

我问庄先生，当时学校有没有觉得投票有可能失败？庄先生笑笑说：或许有人这样担心，但是我们的董事会是非常有信心的。

他说，我们相信华中的校友一定会支持，社会也一定会支持，因为这与学校一贯坚持和倡导的精神理念是一致的，而且华中文化与精神在新加坡也已经根深蒂固。

庄先生的自信，和他气宇轩昂的气质还真有点契合，我们两个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当然，我也相信，我甚至觉得这是必须的！”



华侨中学园(图:韩昕)

“幸运的是，校友们还有当时在籍学生及他们的父母，都积极支持我们的呼吁，上网投票。因为有了华中大家庭成员的支持，我们取得了压倒性胜利，‘Tan Kah Kee Station’以高票当选，成为坐落在华中校区内的地铁站名字。”

### 华中精神的胜利

听到庄先生的话，我的眼中忽然就盈满了泪水，我觉得这句话饱蘸着感情和感恩。

“饮水思源”让华中的学子们认识到，感恩创校先贤陈嘉庚的意义，“自强不息”又鼓励鞭策董事部和校友努力争取，不放弃。

“这真是太棒了！”我几乎是喊出这句话来，并和对面的庄先生来了一个有力的握手。

庄先生毕业于华侨中学，对“自强不息、饮水思源”的华中精神和文化的认识，不只是来自于华侨中学，也深受他的父亲庄右铭老先生的影响，庄老先生是新加坡著名的华校创始人和教育家，服务中正中学30多年，兢兢业业，呕心沥血，重视对学生文化与精神的培养，写下大量的论文。老先生过世后，

庄绍平整理出版了《庄右铭文集》，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地传承下去。

和庄绍平先生谈华中精神，也不只是这次访问，在2019年新加坡首届慈善论坛上，庄先生受邀作为主讲人特别讲述了华侨中学慈善精神的传承和广泛传播，他骄傲地说：“华侨中学每次筹款都顺利完成，而且是超额，为什么？因为每一位华中学子都深深记得‘饮水思源’。华中学子们秉持‘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成功以后，又不忘回馈母校和社会，这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华中精神鼓舞了每一位华中学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所以，在学生时代，注重精神文化的培养确实是学校教育的头等大事！”最后，庄先生用这一句看似平淡的话结束了我们的访问。

走出学校董事部，远远地就看到陈嘉庚雕像，凛然地矗立于饱满的阳光之下，整个校园气势雄伟，昂首向前。

## 李成传世作品研究

文 / 杨仁恺



北宋（传）李成《茂林远岫图》绢本 水墨 45.9cm×141.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李成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及其流风余韵，在历代画家中享名最盛，影响最深。其所以如此，在于他的山水画风格融汇了唐人发展的若干特点，进而结合大自然雄浑博大而又多变的气魄，运用了山水水墨画独具五色的功能。纳丘壑之灵于笔下，再现大自然的风光，更集中地表现其艺术才华。他既蕴藉着文人骚客的诗情画意；气韵横溢，却又于精熟的技巧中，描绘一丘一壑，一草一木，景物变化，季节交替，无不赋予盎然的生命，这正是使我国山水画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无怪《宣和画谱》称誉李成“于凡称山水者，必以（李）成为古今第一”。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也认为“国初营丘李成画山水，前无古人”。说得更为具体的当以王辟之的《渑水燕潭录》：“（李）成画山水寒林，前所未尝有。气韵潇洒，烟林清旷，笔势颖脱，墨法精绝，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画家百世师

也！”在此段评语中，王辟之指出李氏的山水“前所未尝有”，“寒林”亦为“前所未尝有”。其意就是新格的第一次出现。特异之处为何？就在于“气韵潇洒”，即是不板刻的对语；“烟林清旷”，出自胸有丘壑；“笔势颖脱”，指的是作者的高超技艺，不受成法的约束；“墨法精妙”，提的正是关键问题，在“精绝”二字上，极有分量；至于“高妙入神，古今一人”，是承上面的各方面成就综合后得出的论点。于是肯定“真画家百代师也！”两位南宋评论家如此重视李成，也许出于各自的爱好，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李成的山水画格已臻于完美境地，是古往今来从事中国绘画史者所一致公认的。北宋名家郭若虚也有类似的论点，或为此两家所本。但是，事情独有例外，北宋后期著名画家兼鉴赏家米芾对李成颇有微词；金代元好问在自跋《密公宝章小集》中谓“宋《画谱》，山水以李成为第一。国朝张太师浩然，王内翰子端（庭筠）

奉旨品第书画，谓李笔意繁碎，有画史气象，次之荆、关、范、许之下。密公（完颜琬）赏识超诣，亦以此论为公”。因为王庭筠书画出自米家父子，而米氏崇尚南方董源画派的，故有“李（成）笔意繁碎，有画史气象”之讥。殊不知范（宽）、许（道宁）实源于李氏，如果元、王、完颜之说成立，岂非本末倒置？即使如此，也并不有损于李氏的艺术成就。

值得研究的是李成传世作品的真正面貌如何。两宋名家对之多有所议论，说来也比较具体，究竟文字的描述不尽如图像的直观明确，如按记载求索，未必能寻到真正代表之作。再加上笔者所接触到的作品，不尽相同，因而其概括甚难吻合。对待李成作品真贋之鉴别，因为米芾当时所见300幅，仅两幅为真，即此两幅，亦已渺若黄鹤。米氏遂有欲作“无李论”之说。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铃木敬综合各家之言，以为李氏作品所以稀少，概

括起来有三个客观因素：第一，据南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记载，裔孙有使相国寺僧惠明以重金收买乃祖作品。第二，米芾《画史》述及宋仁宗在位，爱好李成画，其后神宗朝郭熙地位显赫，而郭氏为李成所出，因而李氏之作随之受到尊重。《宣和画谱》中收藏159幅，未必全属真迹。第三，靖康之乱，开封内库被劫一空，李成作品随之散佚殆尽（《跋李成和〈小寒林图卷〉》待刊稿）。我认为此三种因素都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凡是古代作品都经浩劫，加上兵燹、水火等天灾人祸，以及自然界的诸般破坏原因，使名迹受到的灾难，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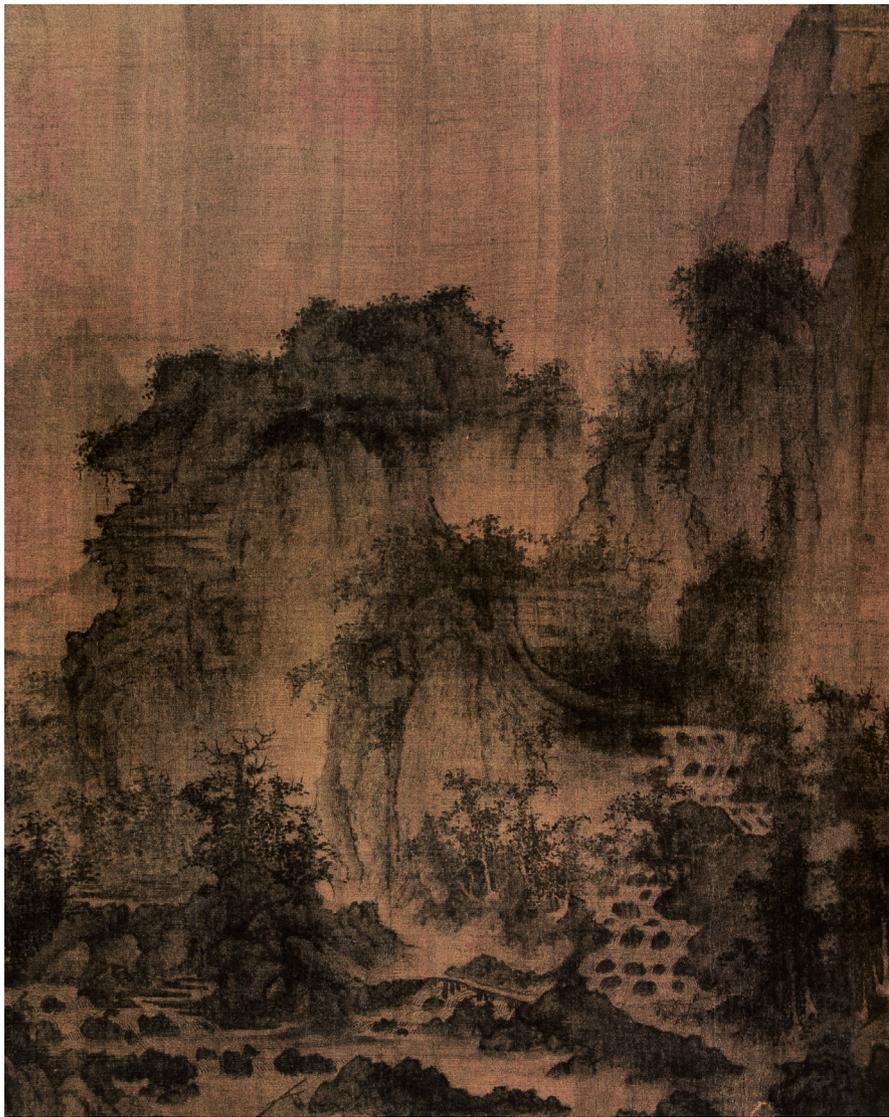
米芾所见之300幅李成画，绝大多数为赝品，按他本人的说法，尚有两幅真迹；宣和内库度藏的159幅，不知米氏可曾入目，是否算在所见的298幅的赝品之中？我以为他并未见到，其中不可能一件真品也没有。前人中亦有此论调。因此，我怀疑米氏所具有的浪漫色彩，好作惊人之笔，所认为赝者未必都可靠，事实上他也有失误之处。毕竟一个人所见有限，内库条件具备，不等于天下珍品一件不遗地为其所有。因此，“无李论”在逻辑事实上已被米氏本人所否定了。今天的实际困难，只能根据文献资料和辅助材料来推断。

## 二

根据《茂林远岫图》画卷本身进行客观的记录，附带做了肤浅的推测。

### （一）画卷的题跋

原作为绢本水墨山水手卷，画心高45.9 cm，长141.8 cm；题跋高44.8 cm，长158.9 cm。有南宋人向冰、元人倪瓒、明人张天骏三跋。向氏跋文叙此卷之流传经过；倪氏从作品技法、风格述其源流；张氏据向、倪两氏题跋综合言之，并说明为明弘治内监吴用诚而为之



《茂林远岫图》（局部）

题跋。向氏题跋时为南宋宁宗赵扩嘉定12年（1219年）冬至日；倪氏题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至正25年（1365年）6月20日；张氏则题于明孝宗朱佑樞弘治3年（1490年）8月25日。

### （二）收藏印记

画身前后和拖尾上钤印累累，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古印已模糊不清。最早印记中较为清晰者，以南宋贾似道之“秋壑珍赏”一印和拖尾“封”字半印可辨。元代初期鲜于枢“困学斋印”钤于向氏印章之下。明项子京印章多方，清初真定梁清标签藏数印。与梁氏同时之扬州装裱名师，而为其在江南一带收

购名画之张鏐黄美者，扬州人，在拖尾上钤“邗上张鏐黄美拜观”朱文印一方。画卷上和前隔水有乾隆先后两诗题，并钤七玺，印记齐全。

### （三）各家著录

此卷最早见于《清内阁所藏名书画目录》，再早则尚未发现。明代文献中，有《清河书画舫》《书画见闻表》，清代有《大观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墨缘汇观》《诸家藏画簿》和《石渠宝笈初编》。从诸书著录观之，绝大多数作者认为是李成之作，他们是根据向氏、倪氏两跋得出推论的，唯明人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竟以为原



北宋 李成 《晴峦萧寺图》  
111.4cm×56cm 绢本 设色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画为人拆去，故贾氏“封”字印不全。按张氏著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即他在《铭心录》百首诗内对此卷作为铭心之品，又认为被人换去。实则，“封”字

所以留存半印，乃原卷之残，应早于万历，系改裱时被裱工将原隔水绫揭除，致成半印。假如画上竟无贾氏其他印记，当易启人疑窦。可是，卷后左上角

钤有“秋壑珍赏”一印，赫然在目，说明原画并未被换，张氏之说，难于成立。

#### （四）今日流传之所谓李成作品

古画中冠以李成之名的作品，从著录上来看，为数可观，《宣和画谱》中记载百余件。北宋以下诸书，亦偶有李氏作品著录出现。总的来说，画上都没有作者的名款。固然，此时有名款的作品绝少。国外传为李成作品者有《晴峦萧寺图》，现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寒林骑驴图》；麻省佛哥美术馆《寒林图》《飞流危栈图》《峻峰茂林图》；福利尔《雪麓早行图卷》《文姬降胡图卷》《山水图册页》《寒林图》等作。还有日本的李成与王晓合作之《读碑窠石图》《寒林图》。国内除此卷外，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尚有《小寒林图》《寒鸦图》；台湾有《寒林平野图》《瑶峰琪树图》《寒林图》诸迹，加在一起，达十余件之数。这些作品面貌并不一致，彼此之间就有较大的出入，以何者为李氏真笔？客观要求我们做出答案，而答案却是相当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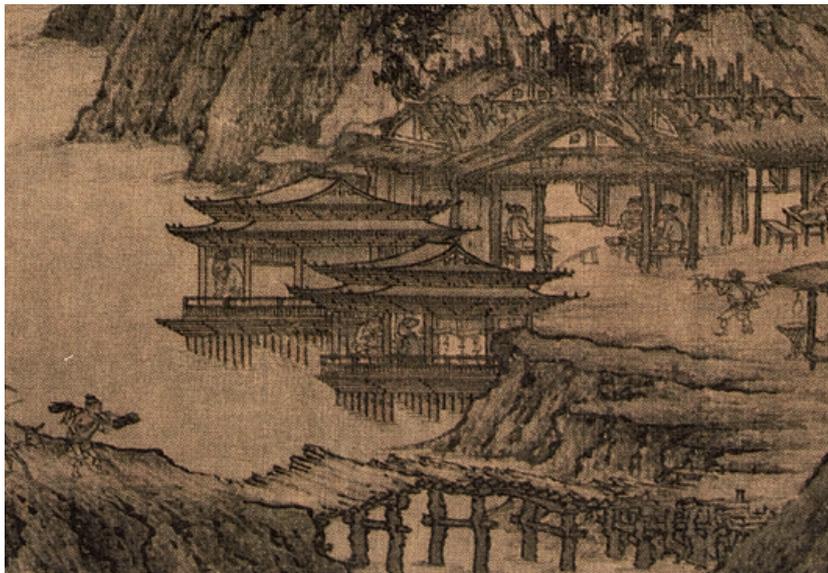
#### （五）李成的真貌究竟如何

画史谓营丘李成之画，皴法如卷云，作树无枝不屈。今之《寒林图》，流传数本，有类似画史之说者。一般认为北宋许道宁、翟院深、郭熙、王诜得李成之衣钵，尤其是翟院深，可以乱真，故前人指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李氏160余图，不能不讶其多，说者曰：皆翟院深笔也”。米芾欲作“无李论”，后见一松、一山水真迹，于是作罢。可见李氏真迹绝少。而米芾所见两幅真品，未见传下来，其面貌如何，不得而知。文献上所记载李氏派系风格，郭熙、王诜又与许道宁有所不同，而许氏去李未远，可靠性较大。今传许氏之《秋山鱼艇图卷》（纳尔逊美术馆

藏），山势的渲染，峰峦之间的变换结构，有时改用折带勾描，长线皴，淡墨渲染，这些都是郭、王的皴法，鹿角树枝的画法有所不同。至于滩石水口，在他二人画中也属少见。顾复《平生壮观》有云：“营丘（李成）皴法如卷云，今见其细直皴，不见其回翔态也；作树无枝不屈，今见其点叶，小树满山，未常见屈曲形也。二端者，尽人知之，而此图（《晴峦霁靄册》）反是，何哉？予欲得世之具慧目，操直笔如元章者师之。”由此可知，前人对李氏风貌已经不易分辨。上节提及之《寒林平野图》，宋徽宗赵佶亲笔题签，或有所本。就其风格观之，诚属与郭、王接近，但苍劲沉厚凝重则不足。《晴峦霁靄册》经董其昌鉴定为李氏绝真之品，而画法却与《寒林平野图》异趣，《瑶峰琪树图》为耿精忠故物，又是一种风貌，有风马牛之势。如此说来，今日诚当作“无李论”欤？

#### （六）从此卷中探索李氏消息

今天传世之李成作品中，已经出现三种以上的面貌，可以说，一个名画家的面貌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创作时间的先后不同，因而存在各种风格。我们应客观考察此卷的若干特点，就其作品本身而言，许多鉴定家认为是燕文贵之作。燕氏有《溪山楼阁图》，风格大体近此卷，唯总的是润泽清秀有余，凝重深厚则不足，崖石却用牛毛皴，山峦轮廓线勾用浓墨，这是两者同中有异之点。必须指出，如原定为燕氏之《夏山图》，经方闻教授根据传世资料改定为屈鼎之作；原定为郭熙之《溪山秋霁图卷》，经谢稚柳氏改定为王诜之作，都是有充分理由的。相似不等于就是同一作者之作，往往因继承的缘故，表面近似，实质各有特色，否则，岂不成为复制本，有何创作之言？所以，应于同中求异，方能显出差别，露出本质。



《晴峦萧寺图》(局部)

我读过东京大学铃木敬教授的文章，他对我国山水画的分期、分派有独到见解，在此不拟表任何意见。倒是在许道宁、屈鼎、郭熙三家作品找出共性这一点上，很有卓见高识，深表同意。不难理解，荆浩的传统对李成以下诸家的影响是共通的，因而才有可能出现一些共性来。既然如此，此卷起码应属于李成系统，因为它与屈鼎诸人风貌有一个共通的源流所致，铃木敬教授一再强调的《晴峦萧寺图》，虽然为了慎重起见，在李氏名上加一“传”字，毕竟是作为李氏作品用来与各家研究对比的。如果再从别的材料中找出可靠的论点，做出科学的判断，此卷作者能够成立，则《晴峦萧寺图》连同为董其昌所肯定，为顾复所忧虑的《晴峦霁靄图》都能得到解决。

直接的论证固然是作品本身，它具有的特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为大家所首肯。再从间接材料中，以向冰的题跋最为有力，他比宋徽宗题《寒林平野图》尤为重要。此乃向氏家传之宝，原为小画屏，犹存唐风，所叙流传经过，当可征信。向氏为南宋时名鉴藏家，韩侂胄所藏书画，均由向氏品定，具有精

确的鉴别才能，应该说是被人们所公认的里手。再说就是倪云林氏，元末四大画家之一，创作有独到之处，又精鉴赏、富收藏。他对向氏之论点既无异词，又在李氏流派上指出源于荆浩，前后脉络，极为清晰，字里行间，不见有怀疑迹象。由此可知，以这两人题跋作为断定此卷作者为李成真迹，看起来是说得通的。

#### 三

从上面的简略记录，读者不难看出我对《茂林远岫图》的作者，是有自己的倾向在的。但我还不能作全面的肯定，仍有待于对现存几件以李成命名的作品，大家认为时代都不得晚于北宋的，提出来作一次对比，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哪些共同点和差异处，评定其优劣，结合文献，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晴峦萧寺图》，当时认为是北宋时代艺术水平很高的杰出之作。试将此图与《茂林远岫图》两相比较，即或是存在所描绘的大自然季节有冬夏之不同，但就技巧和表现手法方面却存在不少一致的地方。如山峦顶部都有小树点缀，山峦腰

部出现马牙皴，兼施长线条皴，信笔从上向下直画，分出轻重笔痕，随后淡墨层层渲染，显出明暗，运笔自然，无造作迹象。飞泉及水口的处理，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对两图有一个相似的感觉。楼台、水阁于不经意处见精神；行旅中的人马车船，笔虽简而神形备，两图的艺术效果又相当接近。但也有相异点，《晴峦萧寺图》山右侧用重笔浓墨勾画轮廓，直条皴笔触明显，下笔粗重。总之是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相当突出的是北宋时代风韵。

如参照北宋诸家文献列出的李成山水的若干特点对照，所谓“李成之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多巧，少真意”，以及“气韵潇洒，烟林清旷，笔势颖脱，墨法精绝”。就此观之，则《茂林远岫图》庶几近之，《晴峦萧寺图》尚留有某些痕迹。如果两图各自独立来进行欣赏，不好定其甲乙。现在放在一起比较研究，立即发现两者之间所表达出来的艺术境界，多少存在差别。文献上一致认为郭熙山水画源于李成，从无异议。郭氏的《早春图》一直是信之不疑的代表名作，其特点相当显明，人们用来鉴别衡量李氏作品，有一定的根据。《读碑窠石图》画中树石近《早春图》和《窠石平远图》，但它和《茂林远岫图》的距离比《晴峦萧寺图》要多一些。后来的鉴藏家大都习惯于用郭氏来作依据评定李作的真赝，而且绝对化了、模式化了，所以在李氏的作品中蒙上一层固定的色调，千古不易。谢稚柳先生认为考察李成风貌应以王诜作依据为近，从《渔村小雪图卷》中可找到共通点。事实上每个名家的风貌不是一成不变的，各有其发展的过程。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在论关仝、范宽、李成三家山水时有精辟的见解，谈到“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

邱讷之流，或有一体，或具体而微，或预造堂室，或分开户牖，皆可称尚”。所提到的8位名家，并未将翟院深、屈鼎、王诜诸人列入，因为他们只能入不能出，翟氏学李成惟妙惟肖，惜不擅长自运；屈鼎学燕文贵殊无新意；王诜学李成不脱郭熙窠臼。据此不难理解，真正要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就得有独具的风骨，就不是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的模仿者。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注意及此，庶几不至于蹈前人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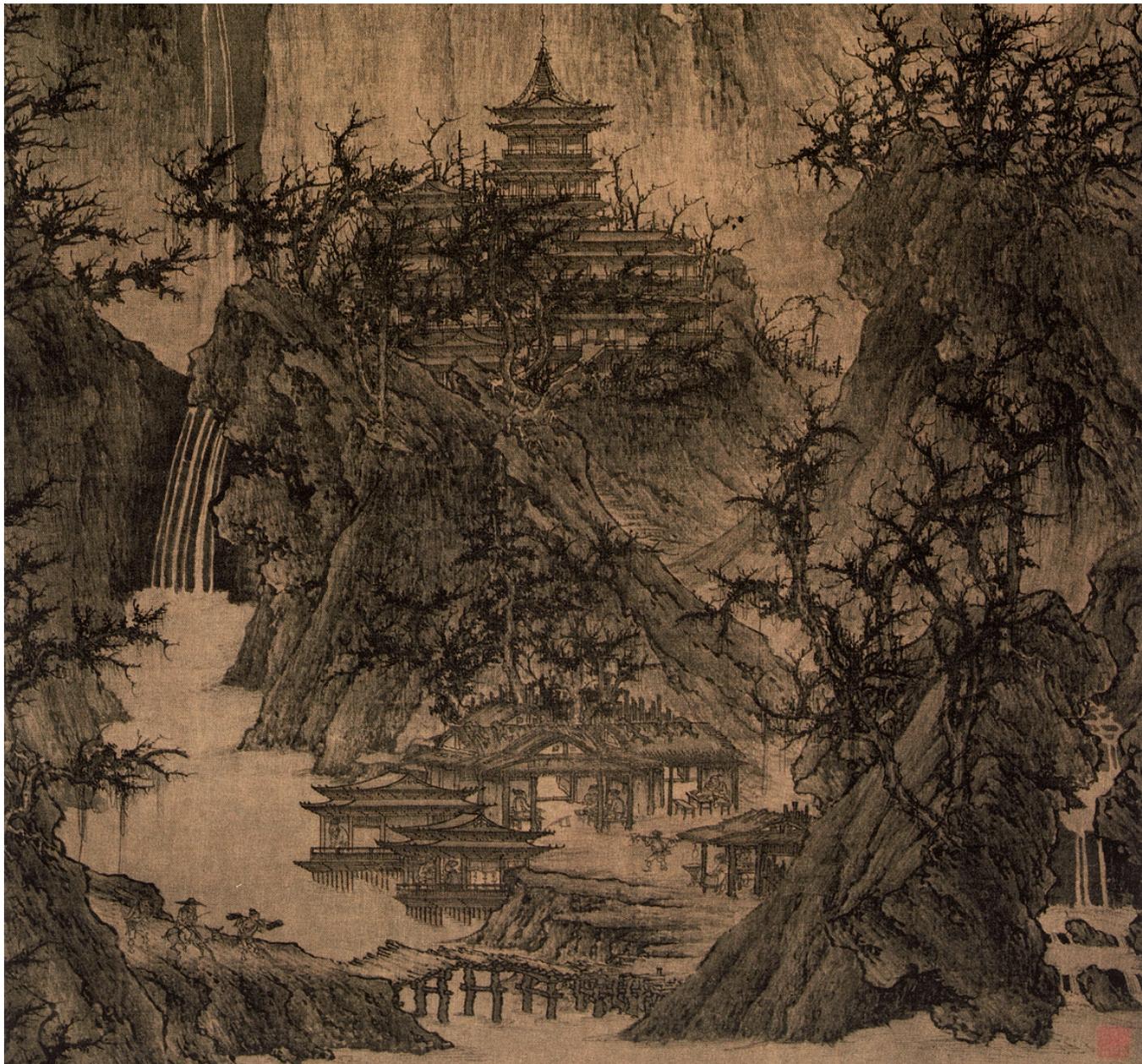
对于《茂林远岫图》的作者，学术界中出现一种新的提法，认为它不可能属于李氏手笔，应该是燕文贵真迹。按照郭若虚的说法，燕氏画中有李成的“或有一体”，当可凭信，如因之进而说是燕氏之作，还得用其几件传世代表作品加以比较，乃可见其分晓。

燕文贵作品传到今日，被大家公认为真迹的不过数件而已。我这里用他的《江山楼观图》《溪山楼观图》和《烟岚水殿图》三图加以分析。《溪山楼观图》上有作者名款，可与郭熙《早春》《平远》二图同珍。先就所列的三图对比，彼此的基调一致，用笔尖劲，楼阁界画之工整精到，为其共通的特点。山头不点小树，露出光秃秃的山顶，树多曲干，多数露出盘根错节，单叶中兼施夹叶；流泉先用线勾出，而后填墨。这些也是三图共有的特色。再就是山石的勾皴，下笔粗壮而用墨甚浓，且以曲曲的笔势，有尖有圆，皴法有小钉头，中锋短直条，配以渴笔干擦。尤其是在《烟岚水殿图》中，山石里夹杂破碎的和毛毛的点子作皴，有一种草率不经意的感觉。有人说他是得范宽的体势，但风格嫌其过于质朴而少峻拔豪迈的气魄，也许正是“燕家景”的独传之秘。

从以上对燕氏山水自身所具有之特色与《茂林远岫图》比较，它们的时代

风格，同属北宋早期无疑问，若从具体描绘中，不管是山石、树丛、楼阁、人马、皴法诸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并非发展中出现的现象，而是作者个人风格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同样，历代被认为燕氏之《夏山图》（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已改属屈鼎所作，此卷形式上较燕氏三图与《茂林远岫图》为近。但如果进行比较，不能发现其间存在的继承关系，屈氏在表面上虽达到近似的程度，但实质上还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气格方面，非他人所能追踪得到的。至于水边亭榭的一致，用以认定屈氏学自燕氏，从而推论《夏山图》与《茂林远岫图》更为接近，进一步断定后者必属燕氏手笔的又一依据。用间接材料作比较研究固无不可，然则《晴峦萧寺图》亦当划入燕氏作品范围之内，因为它也有水榭的所谓“燕家景”特色。若单就形式的某一部分而认定一位作者或画派，毕竟可靠有限，还是全面衡量，综合比较才可征信。

我以为北宋名鉴赏家董道在所著的《广川画跋》中论李成山水有一段文字值得回味。不妨摘抄如下：“营丘李成熙（成），士流清放者也，故于画妙入三昧，至无蹊辙可求，亦不知下笔处，故能无蓬块气。其绝人处，不在得真形，山水木石，烟霞岚雾间。其天机之动，阳开阴阖，迅发惊绝，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气生于笔，遗于像。夫为画而至相忘画者，是其形之适哉？非得于妙解者，未有能遗此者也。”董氏行文虽较抽象，细细玩味，仍可索解。其中涉及具体技法部分，颇有见地。如“妙入三昧，一天蹊辙可求，亦不知下笔处，故能无块气，其绝人处，不在得真形”末句固然不好领悟，似可理解为精妙笔墨不是如实描绘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而是经过画家艺术加工的集中的典型，所以才有可能使笔下



《晴峦萧寺图》(局部)

的“山水木石，烟霞岚雾间。其天机之动，阳开阴阖，迅发惊绝，世不得而知也。”“开”“阖”“迅发”包括于“天机之动”中，关键在于一个“动”字。尤为精辟的论点为“夫为画而至相忘者，是其形之适哉”一语，他把艺术创作的真谛揭示了出来，较之一般论述又进了一层。任何一种技艺不到“相忘”的境界，势难赢得后世的崇敬。历史上，顾恺之的画痴，张旭和怀素的颠绝；此外，庖丁解牛、伯牙抚琴等一系

列的故实，莫不经历过“物我相忘”的阶段，结下了不可解的因缘。

说来似乎有些抽象，而抽象正是从具象中来，使我们用于比较研究法，避免见树不见林的失误，未知是否有当？有待于继续验证。

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回到具象，这对于我国古代书画的鉴定，不失其为可行的办法。因此，让我们回到第二节对《茂林远岫图》的全卷所做的记录，包括历代流传印记、南宋名鉴藏家

的题识、元代大画家著录等，已知此件名迹被认为是李成的真迹。目前找不出更有利的根据否定它，经过一系列分析比较，综合考察，提不出什么反证，与其长期缺疑，成为绘画史上的悬案，何不把它视为李成真迹这一客观事实，这并不影响学术界对之深入研究，即便是将来发现新资料，出现了新观点，甚至是相反的观点，也不至于影响此幅名作原有的光辉。